



红旗

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目 录

新年献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元旦社论（3）

思 想 评 论

为反修防修建设理论队伍.....袁 青（7）

认真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于 冬（13）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向 伟（17）

要有一个全面规划.....宫效闻（22）

认真看书学习 继续批林批孔

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纪 平（24）

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

——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高 黎（30）



揭露“让步政策论”尊儒反法的本质

.....上海钟表元件厂三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35)

批判林彪的《论短促突击》.....詹立波 (39)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前进.....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党支部 (45)

为什么说荀子是法家?.....唐晓文 (50)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些经验.....赵丰年 (57)

以路线为纲学大庆.....田志松 (63)

制订规划 乘胜前进.....河北遵化县沙石峪大队党支部 (69)

依靠工人群众办好企业.....上海手表厂党委会 (74)

党的基本路线指引我们胜利向前

.....辽宁营口县水源公社党委会 (78)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建设新农村

.....江苏邳县丁楼大队党支部 (83)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疆英吉沙县包孜洪十五大队党支部 (88)

杂文：“传心术”的妙用.....赵 前 (92)

☆ 一 月 一 日 出 版 ☆



毛主席语录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主席语录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新年献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

一九七五年元旦社论

团结战斗的一九七四年过去了，我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跨入了一九七五年。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过去的一年，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批林批孔运动。亿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进一步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宣扬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前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发展较快，毛主席倡导的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的空气在许多单位大为浓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革命推动了生产。农业在连续十二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全面丰收。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三年有新的增长。工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都获得了新的成就。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生产建设蒸蒸日上。这同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衰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了社会



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

一年来各条战线的胜利，特别是经过批林批孔运动，使人们从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反修防修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松懈自己的斗志。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又一次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这十年来，我们认真实践了毛主席这个教导。在当前的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继续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

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要抓住路线问题，抓住他们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实质，从政治上、理论上批深批透，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批判他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少数没有很好批林批孔的单位，应当认真批一下。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还需要继续努力。在批判中，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应当同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加强战备、加强部队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批孔应当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更好地结合起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主要的军事著作，还要深入学习。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学，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这样，才能带领群众把革命大批判深入下去。



学习和批判要紧密联系实际。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重点，做到有的放矢。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系列指示，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进一步促进革命团结。要推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前进，继续搞好斗、批、改，注意总结各方面的新经验和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要联系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领导机关首先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并善于运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来指导工作，抓好典型，抓好重点，抓好三分之一，扎扎实实地有步骤地解决本地区、本部门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联系实际时，要始终注意掌握斗争大方向，切实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准确地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

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要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大办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基础工业，**认真抓好国防工业**。要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群众运动。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必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我们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进一步加强部队建设，认真搞好军事训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加强



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充分发挥民兵的战斗作用。全国军民都要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委必须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成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战斗指挥部。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增强“一班人”的团结，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要紧密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接受群众的革命监督。党支部要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党员要努力实践党章中规定的必须做到的五条，增强党的观念，遵守党的纪律。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工、农、妇、青等各种群众组织的作用。

过去的一年，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新的成就。我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日益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扩大。当前，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奔腾向前。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反对两霸的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两个超级大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世界更加动荡不安。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科学分析，加强对国际形势的研究，特别是对苏美两霸的相互争夺和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广大群众和干部都回顾一下过去的工作，议论一下形势和任务，订出本单位的大体规划，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着新的胜利奋勇前进！



思想评论

为反修防修建设理论队伍

袁 青

在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形势下，全党正在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回顾一下建国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理论战线上斗争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应当怎样建设这支队伍，把它真正当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抓紧抓好。

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理论斗争始终是围绕着巩固还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围绕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问题而展开的。毛主席指出：“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包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长时期中理论战线斗争的一个基本任务。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种状况，必然在理论战线上反映出来。妄图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凭借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阵地，制造反革命



舆论，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理论、思潮和口号骗人，反抗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在开始进行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刘少奇就抛出了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口号；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刘少奇、陈伯达提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反动理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又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鼓吹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谬论。这类谬论总是要抹杀和歪曲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内路线斗争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所有这些谬论和口号，都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针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再一次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十年来，我们认真实践了毛主席这个教导，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驳斥、戳穿和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谣言和诡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各项工作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思想领域中其他历次重大的理论斗争，如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反右派斗争、对“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的批判，等等，也是同坚持或反对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一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所决定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上层建筑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的势力和影响还存在，理论战线上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仍然尖锐而复杂。在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垮台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继承刘少奇的反革命事业，从政治上思想上继续同我们党和人



民进行较量。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和批判了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口号和倾向，为我们拨正社会主义航向，引导我们在理论战线上不断取得新胜利。

叛徒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了反对毛主席所坚持的辩证唯物论和多次指示，煞费苦心地从孔孟之道、资本主义和新老修正主义这些垃圾堆里汲取“养料”，拼凑反革命理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抛出的“天才论”，就是他们的反党理论纲领。这是为他们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服务的。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用唯心史观反对唯物史观，用谣言和诡辩制造理论骗局。有的同志由于学习马列不够，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以致一度上当受骗。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及时告诫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这是对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沉重打击，也是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重大胜利。

林彪反党集团曾提出各种反动口号，妄图分裂我们的党。这些口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抹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们把严肃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歪曲成什么“这一部分人”同“另一部分人”的矛盾，妄想以此欺骗一些人。他们极力攻击和诬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把党的领导诬蔑为“封建专制”，妄图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否定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全党提高了路线觉悟，坚决维护了党的团结，林彪的分裂阴谋终于彻底破产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但是，肯定还是否定大好形势的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林彪一伙及其所代表的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本性，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我国的大好形势说成漆黑一团，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由于自己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总是要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我们一些同志对大好形势有时看得不那么正确，则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掌握唯物辩证法。这时，毛主席又一次教育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



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澄清了一些同志在形势问题上的糊涂观念，使我们懂得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从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同样存在着理论战线上的斗争。批林批孔本身就是上层建筑领域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年来的，在理论问题上毛主席怎样不断地为我们指明了航向，引导我们深入地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引导我们不断增强革命团结，以及引导有的同志正确认识关于个性和共性、关于批林是批判其叛党叛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还是批极“左”等类问题的过程，就可以看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是何等重要了。

二十多年来，理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是长期存在的。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和革命进程的关键时刻，必然会出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学派，出现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和修正，出现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侵蚀和污染。如果不坚持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能得到巩固。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形，许多人由于忽视学习革命理论和看轻理论斗争，不能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以致一度把某种错误的观点和倾向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跟着错误潮流跑。斗争实践尖锐说明了理论上迷失方向的危险性。我们应当认真记取这个严重教训。

思想理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事实还说明，要击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进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一支宏大的有马克思主义批判能力的理论队伍是不行的。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多次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强调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重要性，认为不造成这样一支队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毛主席还非常注意和关心理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总是以满腔热情爱护和支持敢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小人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某些地区和单位虽然也培养了一些搞理论研究的人，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不少人方向不对头，因而在理论斗争中并



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战斗作用，有的甚至堕入修正主义的泥坑。这种经验教训深刻地启示我们，抓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首要的是抓方向、路线方面的问题。只要方向对头了，路线搞正了，我们的理论队伍就能在理论斗争中成为冲锋陷阵、攻克敌人思想堡垒的无畏战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理论工作者所以能够在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作出一些贡献，就是因为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理论工作作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区、各单位的理论队伍如雨后春笋，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以理论队伍为骨干的群众性的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史的大好局面，这是值得支持的革命新生事物。批孔虽然比批林更难些，但广大群众一起来，也就把孔老二批倒了。当然，我们要充分认识，理论工作不是研究了一两个问题就完了的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长期的斗争任务。摆在理论队伍面前的课题是很多的。要继续抓紧批林批孔，切不可因已取得成绩而松懈自己的斗志，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继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国家与革命》）我们要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总结“**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经验。我们不但要研究和总结我国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也要注意研究国际阶级斗争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两霸的争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问题。要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在提高的指导下继续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要把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在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面狠下功夫。把认真看书学习同参加实际斗争结合起来，这是提高理论队伍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成为我们手中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作战的武器。许多地方根据专业理论队伍和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的特点，为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创造了很多经验，应该加以总结和推广。



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识别各种理论、思潮和口号，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理论、思潮和口号，总是要披上一层伪装，用以骗人。但是，我们只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就可以揭示出它们的反动阶级本质。依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检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和口号对于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回答，对于历史发展规律所持的态度，就能够揭露出它们所推行的思想政治路线是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的，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其目的就是妄图拉历史车轮倒退，复辟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现实斗争是历史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现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有其历史渊源，要识别它们，就要把现实斗争和历史斗争结合起来，由“流”溯“源”，研究它们是如何回到它们的“前辈人物”那里去，又怎样继承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请出历史的亡灵来演出反革命复辟的新丑剧。我们要在斗争中努力学会掌握这种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如果学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一遇到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却丧失了批判能力，这说明还没有学好。我们判断一支理论队伍的水平高不高，战斗力强不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们在理论斗争中能不能辨别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同它进行不懈的斗争。

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斗争，是理论战线上的长期任务。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深远的意义。林彪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以孔孟之道作为他反革命复辟的思想武器。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历史，揭露孔学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改变历代反动派对法家的歪曲，科学地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汲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益的东西，为当前的反修防修斗争服务。我们坚信，经过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必将较快地成长壮大起来，去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更大胜利；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认真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于 冬

最近一个时期，许多领导干部纷纷到一些基层单位，深入群众，参加劳动。他们同广大群众一起手推肩扛，为抓革命、促生产而战；并且直接向群众宣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同群众一起座谈，听取意见，进行调查研究。这种做法，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促进了革命团结，使许多单位出现了鼓干劲、争上游、创高产的新热潮。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带来的新气象。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干部参加劳动当作反修防修的一件大事。毛主席指出：“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五·七干校的巩固和发展，除老弱病残者外的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的逐步形成，都证明了毛主席指出的这一真理。最近各级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指出的这一真理。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做好革命工作，没有什么别的“窍门”，最根本的，就是认真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经常深入实际，参加劳动。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同群众共同劳动，并肩作战，很快就成为亲密的知心朋友，上级关心下级，群众信任领导，上情下传，下情上达，事情共同商量，矛盾一起解决，这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当然，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开调查会、经常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一项基本的方法。但是，参加劳动却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通过参加劳动，领导与群众劲使在一起，汗流在一起，心贴在一起，不仅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起到互相激励、互相鼓舞的作用，而且大大增



强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的革命感情和革命团结。这种坚强的革命团结，必然化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更大胜利的巨大力量。工人说得好：领导干部下来劳动，干的活虽然是有限的，但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力量是无穷的。

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尽管工作头绪很多，最重要的，还是调动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空前高涨，这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加快革命和建设步伐的有利条件。但是，各条战线的工作发展总是不平衡的。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群众，既注意总结先进单位的经验，又抓薄弱环节，特别是到那些于全局有影响的单位，参加劳动，帮助工作，对于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常常能起较大的促进作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参加劳动，帮助工作，用群众的话来说，这是“无声的命令”；它常常比干部的任何行政命令，都更能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领导干部到某些工作薄弱的单位参加劳动，帮助工作，那里的生产面貌很快改观，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参加劳动，也是调查研究的好机会、好方法。通过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比较愿意对领导干部说知心话，反映真实情况。通过劳动和座谈，拜群众为师，群众意见直接入耳，对于哪是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哪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什么好的经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及群众有些什么要求和愿望，等等，都有真切的了解，具体的感受。这种从劳动中直接得来的感性认识，是很可贵的。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实运动的了解，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避免主观主义。最近有些同志深入群众、参加劳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眼睛更明亮了，思想更活跃了，考虑问题更实际了，做好工作的信心更增强了，就是因为得到了这种第一手的感性材料的帮助，得到了群众所提供的许多经验和意见的帮助。

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早就指出：“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经常深入群众，了解基层单位的具体情况，收集广大群众在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新鲜的具体经验。用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这些具体情况，集中这些具体经验，是我们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先决条件。有的同志常常满足于对工作实行一般号召和普遍的指导，而认为下去参加劳动、搞调查研究会“耽误”时间，“影响”日常工作，从而把一般号召同个别指导对立起来，把普遍指导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对立起来，这是片面的、不对的。一般号召和普遍指导，是重要的，必需的；但是，一般号召必须同个别指导相结合，才会成为有力的号召，普遍指导必须有典型调查作基础，才会形成有效的指导。有些部门工作进展缓慢，或者有些问题长期不得解决，并不是那里的领导干部没有做工作，而是他们往往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没有认真进行个别指导，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工作抓不到关键处，促不到点子上。最近的经验也证明，领导干部下去参加劳动、调查研究，不仅不“耽误”时间，不“影响”日常工作，而且正是由于这样做了，抓住了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才改变了被动局面，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从而大大赢得了时间。正象下去参加劳动的领导干部所说：在劳动中做调查，掌握的情况真实，提出的措施扎实，解决问题及时，有效地避免了官僚主义。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是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改造世界观，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根本措施。列宁曾经指出，从苏维埃的职员中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就是防止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方法。集体生产劳动，是思想革命化的大熔炉。劳动的汗水，可以冲掉身上的官气和暮气。经常同群众一起劳动，可以增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任何尊卑贵贱之分。领导干部如果脱离群众，不参加劳动，就会忘掉自己普通劳动者的身分，甚至摆官架子，搞特殊化。这样，不仅不能做好领导工作，而且很容易被资产阶级俘虏过去。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群众，参加劳动，受到广大群众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的鼓舞，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革命作风的熏陶，就会感到摆架子、特殊化是低级趣味，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与群众同甘共苦，才是高尚的品质，从而有利于促进世界观的改造。

应该看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



的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们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就是和平演变，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的某些干部，使他们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站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修正主义老爷。对此，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干部之所以犯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忘掉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新老干部，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许多新干部来自工农群众，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但是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地位变了，仍然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不要脱产，又要工作”的教导，注意经常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以便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进一步促进思想作风的革命化。

在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党中央一向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看作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看作是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亲自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多年来广大干部发扬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光荣传统，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而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则一贯贩卖孔孟之道，反对和破坏干部参加劳动，妄图使干部和平演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以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我们要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就必须继续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时，也要批判一切轻视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广大干部进一步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干部参加劳动，贵在坚持。我们要从路线的高度，来加深对深入群众、参加劳动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坚持这一制度的自觉性，从行动上做到持之以恒。最近在许多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各条战线都进一步兴起了干部深入群众、参加劳动的热潮，许多单位制订或修订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具体制度。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坚持这一制度，必将对全党同志思想作风的进一步革命化产生良好的影响，必将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

向 伟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九大”期间，向全党倡导的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几年来，许多地区和单位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及文化教育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认真先抓好三分之一，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去完成许多繁重的革命任务，做好各项工作，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学会掌握这一科学的工作方法。方法是完成任务的“桥”或“船”。按照科学的工作方法去搞革命，搞建设，就会把工作做得又深又细，扎扎实实，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更好地得到贯彻执行。

为什么说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呢？因为它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必须经过波浪式的向前发展的过程。**“先抓好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正是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辩证法。毛主席说：“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我们做其他任何工作，也只能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做，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地去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集中优势兵力”使用于那些对全局最有影响的单位，“各个歼灭敌人”，而不至于分散力量，落得个“雨过地皮湿”。做工作不抓重点，不抓好典型，不先抓好三分之一，而一下子全面铺开，



这种形而上学的工作方法，对革命事业会产生什么后果，许多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都有比较深刻的体会。用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是一个也按不住的。也许有的同志感到先抓三分之一“太慢了”，其实不然。面上的三分之一虽是局部，但把它扎扎实实地抓好了，真正解决了关键性的问题，却具有全局的意义。三分之一拿下来了，再拿下三分之一，取得面上工作的全部胜利就有把握了。所以，先抓好三分之一，看起来似乎慢，实际上是个多快好省的工作方法。

抓好三分之一的过程，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通过先抓好三分之一，可以使点上的经验逐步地应用到面上的实践中去，既指导面上的工作，也检验、发展和丰富点上的经验。有些典型经验尽管是从蹲点中直接取得的，要用它推动面上的工作，还必须通过实践。因为点上的经验推广到面上，会遇到新的情况和问题，这就必须先在一部分地区和单位取得经验，使点上的经验和这些地区、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提出在整个面上推广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推广别人的先进经验更需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否则，它就不可能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更不可能指导整个面上的工作。点上的经验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它除了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以外，免不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普及点上的经验，需要采取逐步推广的方法。先经过在三分之一面上的实践，加以发展和提高，使之更加完善，以便更好地向面上推广。对典型经验如果不采取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结合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象倾盆大雨那样往面上泼，那末，面上就不容易接受，典型经验就会失去指导作用，不可能在面上生根、开花、结果。

面上的工作强调先抓好三分之一，对于提高领导思想和改进领导作风具有重要意义。要真正抓好三分之一，那是要下很大功夫、花很大气力的。领导干部长期蹲在机关里不下基层，势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工作上必然搞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那是抓不好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必须带领一批干部到下面去，直接同群众见面，一方面当群众的学生，从群众斗争的经验中吸收养分；另一方面又当群众的先生，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使之巩固、持久，并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样，就能防止和克服那种以“想当然”代替调查研究、坐在



机关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从而使工作做出成绩来。正如有些同志所说的：“坐在机关不出门，脱离实际头脑空，搞了一些先验论，变了思想懒了身。走出机关下基层，联系实际才干增，革命理论到行动，思想变红身变勤。”

有的同志担心：集中力量抓三分之一，会不会丢掉三分之二？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我们先抓好的三分之一，不是随意去抓的，而是抓的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一部分，是能够代表各种不同类型单位的一部分。抓好这一部分，就是抓住了牵动全局的链条，就能推动全局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了三分之一，就会有三分之二，乃至更多。况且，我们在抓三分之一的时候，也有人分管整个面上的工作。

也有的同志认为：“抓好三分之一就是抓了典型，可以不必再抓点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不抓点，没有典型，抓三分之一就没有方向。抓三分之一，只有在典型的指导和推动下才能抓好。如果把三分之一都看作典型，用抓三分之一来代替抓典型，那就会造成点面不分，无所谓点面结合、以点带面了，那就不能真正抓好三分之一。先抓好三分之一，对点来说，是由点到面的逐步推广；对面上的三分之二来说，则是扩大了的点。这也可以说它是典型的扩大，全局的缩影。抓好典型，再抓好三分之一，做到以点带面，就会使全局的工作出现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

工作中是不是“先抓好三分之一”，效果大不一样。湖南省安乡县，过去县委对改变面貌缺乏信心，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资本主义势力抬头，农业生产搞不上去，粮食产量很低，亩产只有三、四百斤。文化大革命以来，县委认真总结了铁路湾大队党支部坚持农业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重新安排山河的经验。怎样推广这个经验呢？他们改进领导作风，实现机关革命化，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面上的工作先解决三分之一的问题，再解决三分之一的问题，最后实现了由局部转变到全局的转变，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气象。现在，全县已建成二十万亩田成方、树成行、渠成网的社会主义大农田。从一九六九年起，粮食年年跨《纲要》，其中有两年起千斤。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坚持科学的工作方法，对于



做好工作、促成事物的转化是多么重要啊！

怎样先抓好三分之一，许多地区和单位通过多年实践，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完成各项革命任务，是完全必要的。

先抓好三分之一，必须全面规划，统筹安排，首先抓住那些对全局说来是举足轻重的部分，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将一个地区或单位简单地机械地平分为三，随手取其一块，这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因为任何地方都有两头，即有先进和后进，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先进和落后这两个对立面，才能发生重大的影响，把中间带动起来。这样，有目的地选择不同类型的地区和单位开展工作，通过推广点上的经验，使之成为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板，从而促使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全面向前进。

抓好三分之一是需要一批力量的。这些力量从哪里组织起来？唯一的办法是从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门来动员。动员可以有不同方式。有一种方式是：机关在职干部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人员蹲点，三分之一的人员抓面，三分之一的人员做日常工作，定期轮换，这对于抓好三分之一在组织上就有了可靠的保证，对于机关革命化和干部思想革命化也是很大的促进。**“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大批干部下去抓好三分之一，只留少数干部做日常工作，有利于机关真正做到“精兵简政”，克服“五多”，面向群众，服务于基层。机关干部从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经常有机会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密切联系，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搞工作才能“说到点子上，抓到要害处”；同时，还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中，向群众学习，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改造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

无论是那一级的干部下去抓三分之一，都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基层党组织进行工作。离开了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三分之一是难以抓好的，革命任务也是难以完成的。当好参谋，这是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下去的干部的要求和希望。包办代替，或者袖手旁观，基层组织是不欢迎的。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



大多数,和他们一起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帮助他们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善于发现和调动群众中的积极因素,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他们就会在同阶级敌人、同资本主义倾向、同自然的斗争中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到面上去抓三分之一应该着重抓什么?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搞好批林批孔,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于各个方面,无论做那项工作,都有一个方向道路问题。紧紧抓住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能推动和搞好各项工作。如果不抓这个根本,对大事撇开不管,在具体事情上纠缠不休,那就不仅做不好工作,搞不好生产,更严重的是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因此,我们无论是到工交、农村、财贸、文教等那条战线的基层单位去帮助工作,都要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观察形势,分析问题,紧密联系实际,继续深入批林批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运用当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生动事实,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大家真正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自觉地、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抓住根本,才能真正把三分之一抓好。

有一种说法:“已经抓了几遍三分之一,早抓完了。”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形势不断发展,革命没有止境。新生事物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新的任务更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必须不断地分析新形势,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任务,坚持科学的工作方法,不断地解决新的问题,完成新的任务。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抓三分之一的每一循环,都有着更新的内容,可以提到更高的水平。所以,不论是那条战线和做那项工作,都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先抓好三分之一”这一科学工作方法长期坚持下去。



要有一个全面规划

宫效闻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形势下，很多单位的群众和干部遵照毛主席早已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示，在制订建设社会主义的远景规划。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建国以来，我国每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出现，总要在人们面前展示一幅更加光辉的远景，激励人们更加自觉地规划伟大的未来。制订远景规划，反映了无产阶级高瞻远瞩的雄心壮志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仅可以把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集中起来，充分挖掘各方面的潜力，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而且可以对广大群众进行具体生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

毛主席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制订规划也应当这样办。一定要确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的教导。是艰苦奋斗创新业、大干快上多贡献，还是满足于“步子不大年年走，成绩不大年年有”？这就是两种思想的斗争。只有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订出的规划才能起到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制订规划是为了准备经过艰苦奋斗逐步实现的，不是为了好看。那种“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也不是群众所要求的，它不能真正反映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因此，在制订规划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那种不切实际的做法，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制订规划必须依靠群众。只有这样制订出来的规划，才既是先进的，又是可靠的。毛主席说过，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我们虽然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但是，由于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长期存在，那种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领导高明”，“上智下愚”等旧思想、旧作风，还会在制订规划过程中不时地反映出来。因此，制订和实现规划的过程，也就是深入批林批孔的过程。不批林，不批孔，不但订不出好的规划，而且有走偏方向的危险。



制订规划，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根本性的指示，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既要看到全局，又要看到局部，兼顾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两个方面。有的同志说：“什么规划不规划，抓好眼前是实话”。抓好眼前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不够。对于远景规划的意义，毛主席早就说过：“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没有长远的目标，眼光只看到鼻子底下那一步，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格，而是十足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近期计划。许多先进单位都有这样的经验：订了远景规划，把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了，又趁热打铁，订出近期计划，立即付诸实施。这就使群众看到了全面规划的效果，“远景变近景，越干越有劲”，从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实现全面规划作出更大的努力。

制订规划，一定要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作为一个经济部门，一个生产单位，不仅要订出若干年内经济发展的规划，而且必须对于抓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加强政治思想和巩固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对于批林批孔如何普及、深入、持久，作出规划。同时，作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各部门，也要相应地订出各自的规划，使自己的工作适应革命和生产的发展。上层建筑各部门制订的规划，根本的内容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使上层建筑能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工农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等新生事物的涌现和成长，向上层建筑各部门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不断改进以适应经济基础的新发展。订出切实的规划，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就是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毛主席说：“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二十五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实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再过几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认真看书学习 继续批林批孔

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纪 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主席于一九三六年写的一篇著名的军事著作。毛主席的这篇著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军事学说。它从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尖锐地批判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也直接地批判了林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学习这篇著作，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批林批孔，加强战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要把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作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根本思想原则，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要不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正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

毛主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这对于今天我们各条



战线上的同志，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局性的规律，正确地认识我们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根本战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局部的任务，在工作中实现理论同实际的统一。如果不认识全局性的规律，局部工作就会走偏方向。毛主席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引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机会主义路线正是因为在战略问题上错了，违背了客观实际，所以战役战术的指挥就必然是错误的。

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我们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了这个理论，就可以使我们认识战争发生、发展的原因，区别战争的性质，预见战争发展的方向和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马列主义理论并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指挥每一场战争的具体方案。革命战争有其不同于一般战争的性质和规律，每个国家的革命战争又都有其特殊的情况，特殊的规律，我们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除了研究其一般规律之外，“**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使主观符合客观，就会丧失主观指导能力，走上失败的道路。只有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战争进行具体分析，“**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就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典范。在这本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光辉著作中，毛主席首先明确划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性质相反的战争，指出“**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这就彻底批驳了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对革命战争的攻击和诬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为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问题指出了正确的出发点。接着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了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样几个主要特点，并且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

正是在科学地分析了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毛主席英明地提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战略



思想，为中国革命战争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毛主席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于军事学，在当时敌人强大、红军弱小的状况下，指明“**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把克敌制胜的信心放在人民力量的基点上，充分发挥红军的优势，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例如，坚持以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战争形式，反对以正规的阵地战为主要战争形式；坚持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坚持在游击战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等等。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制定出来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结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它们反映了无产阶级不怕困难、以弱胜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反映了重视困难、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反对了轻视敌人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反对了为敌人所吓倒的右倾保守主义。

同毛主席一贯坚持的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相对立的，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特征。党内的各次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右倾的，还是“左”倾的，莫不导源于这个唯心主义的思想原则。林彪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也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批判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对林彪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尖锐的批判。毛主席指出：“**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毛主席这里所指出的“有些人”，首要的就是怀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林彪。这段历史的回顾，揭露了林彪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说明了我们党同林彪的分歧是在革命最基本问题上的分歧。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中，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这确实是一个要不要革命和能不能革命的“最基



本的”问题。林彪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悲观的，否定的。他不相信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哀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认为建立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反对毛主席争取江西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主张搞轻便的“流动游击”，完全放弃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本工作。林彪的军事路线，是一条取消革命根据地、破坏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一条断送中国革命的错误路线。这是林彪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的一次大暴露。正如毛主席在批评林彪的长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的，这种思想方法是“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主观主义，这种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是林彪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要害。林彪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只看到敌人其势汹汹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帝国主义互相争夺、封建军阀互相混战的半殖民地中国的这个特点；只看到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大为削弱的暂时现象，看不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趋势，于是从对时局的唯心主义估量出发，走上了取消革命的失败主义道路。

林彪并没有接受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教育，而是阳奉阴违，顽固坚持他的反动世界观，在机会主义的泥潭里愈陷愈深。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紧紧追随王明，搞唯心论的先验论，不承认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生吞活剥，照抄照搬外国人的经验，全盘否定已被斗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他连续向军委发了三份电报、两封信，竭力主张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他还写了《论短促突击》，兜售他的反党黑货。林彪猖狂地声言：“这种方法不算是诱敌深入，要知道，诱敌深入的方法……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可见，林彪的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是公开的直接的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原则相对抗的，它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大杂烩，是完全无视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唯心论的货色。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实质，指出：“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 and 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王明路线的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 and 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无视蒋介石要借刀杀人的现实，反对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要带着主力部队去直接配合国民党部队。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仍然是从主观唯心论出发，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



人民的力量，消极避战，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特别是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林彪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不听指挥，不听调动，破坏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具体部署。解放以后，在每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他总是明里暗里加入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帮里去，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公然地把毛主席一再批判过的所谓“天才论”这个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黑货，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抛了出来，搞突然袭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场反革命政变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以后，紧接着他又炮制《“571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事物的发展总是同反动派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的，林彪的阴谋遭到惨败，自我爆炸，自取灭亡。这是林彪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总暴露，总破产。

我们把林彪在几十年中的行径联系起来，就会清楚地看到，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的，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货色。**“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也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同理论和实际脱离的斗争。

针对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从各个方面，透彻地阐述了理论和实际统一、主观和客观统一的重要性，还鲜明地提出和回答了**“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这个重大原则问题。是不是善于学习，坚持不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实行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革命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反之，革命事业就要受挫折，就会失败。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所以，我们党把理论和实际的统一，作为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作为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标志之一。对于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才能深刻理解、自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识别刘少奇、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抵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阶级觉悟和工作能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正因为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个原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如此重要，所以王明、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者都疯狂地反对和破坏这个原则。他们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上，不仅自己搞理论和实际脱离那一套，而且还极力宣扬理论和实际脱离的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破坏党的传统作风，毒害我们的青年和人民。正象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批评的那样，王明、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他们那套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广大人民中是通不过的，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彻底破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要努力学习和实行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导，把这一点作为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条基本原则的重要课题。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正确地说明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问题。做到理论和实际统一，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学习、实践和自我改造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遵循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教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自觉地改造世界观。通过批林批孔，在广泛的范围内，促进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缺点的。一部分干部中不认真学习或不坚持学习，不深入群众作周密的调查研究的现象，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在处理日常问题时，有时又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有的同志还不善于通过总结经验来促进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八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毛主席做了基本的总结，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都应当把这些经验当作指导自己行动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忘记。我们应当好好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分析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扎扎实实地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和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

——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

高 黎

毛主席在《矛盾论》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从各个方面深刻阐明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在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特别着重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毛主席在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时候，指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研究事物发展过程各个阶段中的特点，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个哲学思想，对于指导革命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阶段性。这不是人们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形成了事物的发展过程。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决定了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为什么一个长过程又显露出阶段性呢？毛主席详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但要注意研究整个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而且要注意研究被这个根本矛盾所规定和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的发展变化，即研究事物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善于区分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只有这样，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推动革命不



断前进。

毛主席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毛主席还指出：“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既然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是由矛盾运动引起的，所以，注意研究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及其转化，弄清矛盾是怎样发生、发展和得到解决的，这对于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中包含着若干部分质变。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两种状态的运动，反映了事物发展要经过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整个质变的这样一个客观规律。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若干部分的质变，然后引起整个的质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开始的时候，矛盾的两个方面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事物还保持自己质的相对的稳定性，呈现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矛盾斗争越来越激烈，量变达到了某一最高点，这时就呈现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经过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这一阶段所需要解决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就又出现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在新的质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的发展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的革命斗争，也不断地经历着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交替转化的过程。当着阶级矛盾发生激烈的对抗时，引起了社会的大变动，出现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而在这之前和之后，阶级斗争也总是要有一段相对的安定时期。这是因为，敌我双方有一个反复较量、阶级力量对比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阶级斗争时起时伏，时高时低，一张一弛，一乱一治，充分地反映了两种状态的交替，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无产阶级以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任务，就是要经过两种状态的交替转化，不断地实现着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才能最后完成。

两种状态的相互转化，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旧质到新质、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运动。这一次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上一次相对地静止的状态，这一次显著地变动



的状态和上一次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从表面上看，常常有某些类似的现象，但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各有其质的区别。两种状态的每一次转化，都是使事物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相对地静止的状态转化为显著地变动的状态，是前进，是发展。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转化为相对地静止的状态，也是前进，是发展。无论矛盾运动的哪一种状态，都是前进的波浪，发展的一环。我们决不能把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过后出现的相对地静止的状态看成是停滞不前，更不能看成没有矛盾和斗争。如果不是用发展的观点，而是用停滞的观点来看待相对地静止的状态，那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事物，就是不了解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和前进过程中的曲折性的辩证关系，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我们研究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及其相互转化，注意分析事物的根本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形式，注意分析在事物发展长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的矛盾，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找出恰当的方法，去解决不同发展阶段和处于不同状态下的矛盾，以便一步步地解决整个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向来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看作是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当着革命斗争向前推移转变的时候，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不能老是停留在旧阶段。同时，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在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不能离开当前的现实性。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则，才能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依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分析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不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制定出来的，充分体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认真研究事物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弄清事物发展不同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弄清事物的两种状态及其转化，做到主观同客观相一致，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如果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那就会背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适当地处理矛盾，甚至犯这样那样



的错误，给工作带来损失。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些机会主义路线，“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反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决定，根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们永远也做不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左”倾机会主义者，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是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否认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认识仍然停留在旧阶段，拼命把历史车轮往后拉，开倒车。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倒行逆施的顽固分子。他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其实质是极右的。他效法孔老二，扯起“克己复礼”的破旗，穷凶极恶地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去。他的反动思想和阴谋活动，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特别是林彪这个反面教员，给我们上了很好的哲学课。我们要通过批林批孔，更好地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努力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严格地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

事物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是矛盾的运动。然而，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一种矛盾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注意考察这个主要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就可据以区分矛盾运动的不同状态和不同阶段。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不变的，巩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建国以来我们党内发生的四次大的路线斗争，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但是也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也经历了由相对地静止的状态转化为显著地变动的状态的过程。经过激烈斗争，粉碎了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进攻，这场斗争的矛盾解决了，又由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转化为相对地静止的状态，使事物发展推移到一个新的阶段。可见，具体地分析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情



况，才能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问题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分析的方法。

毛主席指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矛盾运动的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都是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这只是矛盾斗争表现形式不同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我们决不能把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的互相转化，理解为斗争和不斗争的互相交替。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无差别境界”。差别就是矛盾。在显著变动时，固然要看到斗争；在相对静止时，也不能忘记斗争。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八年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大大加强，形势很好，批林批孔继续深入，有些后进单位转化成先进单位，全国出现了新的气象。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这种形势，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认真总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大好形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揭露“让步政策论”尊儒反法的本质

上海钟表元件厂三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我们工人广泛开展了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活动。在研究秦汉之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一个问题：“让步政策论”者曾把实行法家路线的刘邦的政策，说成是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在正确评论法家进步性的同时，如何同反动的“让步政策论”划清界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小组的同志翻阅了《史记》、《汉书》等历史材料，并且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了分析，编写了一个讲稿，在工人群众中多次进行宣讲。通过对西汉初期刘邦等人奉行的法家路线、政策的具体分析，揭露了反动的“让步政策论”尊儒反法的本质。

“让步政策论”的鼓吹者，把刘邦的“除秦苛法”说成是封建统治阶级向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一大根据。这是从儒家观点对历史真相的歪曲。

所谓“除秦苛法”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进入秦国首都咸阳后宣布的一项政策。刘邦在灞上召集“父老”大会，宣告：“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汉书·高帝纪》）这就是刘邦“约法三章”和“除秦苛法”的由来。如果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这一政策的内容作一番具体分析，就可明白它根本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秦末，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都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参加了推翻赵高、秦二世统治的斗争，粉碎了短命的赵高政变。在后期，刘邦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但他要推翻赵高、秦二世的统治，必然要以“全民利益代表者”的名义说话，所谓“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悉除去秦法”，只不过是这种姿态而已。刘邦的“约法三章”，实际上很明确地告诫人们不要反对和破坏他的地主阶级专政，这既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说的，也是对农民说的。刘邦为了扩大他地主阶级政权的基础，入关后，对主动投降的秦王子婴及关中地主阶级采取了保护政策，以取得关中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这里哪有什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



“让步政策论”者闭着眼睛不承认“汉承秦制”的历史事实，只是抓住刘邦“除秦苛法”这句话加以歪曲解释。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正好是站在反对秦始皇实行法家路线，反对“焚书坑儒”这样一个儒家观点上，来看待所谓“除秦苛法”的。他们把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活动的一切必要措施都叫“苛法”，并且把这些“苛法”说成都是对农民的，刘邦对农民“让步”，就除了秦始皇之法。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刘邦正是在继承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和政策这一点上，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肖何进入咸阳后，“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肖相国世家》），汉朝的法律基本上是参照秦律制定的。刘邦指示肖何定《汉律》九章，基本上保持了《秦律》六章的面貌。《秦律》是秦始皇之法的主要内容，它是巩固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有力手段，是贯彻法家路线、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重要工具。秦始皇之法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的，但它是地主阶级之法，也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刘邦令肖何对秦律“取其宜于时者”，显然包括了保护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压迫农民阶级的内容。既然如此，那怎么可以把继承秦始皇之法的刘邦说成是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呢？

“让步政策论”的鼓吹者，还曾提出刘邦的“轻徭薄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又一证据。这同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时候，接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由于赵高的复辟活动，严重地破坏了封建经济基础。当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描绘的：“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这是一幅何等破败衰微的景象啊！“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民无盖藏”，这就是说广大农民已经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供剥削的了。再说，连帝王都无力具备四匹纯一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只能坐牛车，足见西汉王朝的财力物力在当时已空虚窘迫到了顶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刘邦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汉书·食货志》），就是其中之一。

“轻田租”是对农民的“让步”吗？根本不是。毛主席说：“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可见，对于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是不会因“薄赋”而改变被剥削的经济地位的。当时真正得益的，首先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刘邦在宣布“什五税一”的政策的同时，就规定了各地王侯、各级官吏的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汉书·食货志》），就是说最终都得从农民身上榨取。这样兜了一个圈子，封建国家从地主阶级身上减去的那一部分税收，又通



过加重对农民的榨取而重新得到了补偿。所以，“什五税一”政策的本质，是在地主阶级内部对剥削比例作一些调整，是处理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政策。既然农民的实际负担并没有因“轻田租”而减轻，怎么能说它是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呢？

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任何一个阶级发展经济，首先都是着眼于这一阶级的政治利益的。刘邦采取了许多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措施，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并不是为了农民。刘邦由于坚持了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其结果，只能是巩固了封建经济基础，使地主阶级得到发展。这一点，连封建阶级的史学家荀悦也不得不承认：“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前汉纪》卷八）。怎么可以把“以资富强”的地主阶级政策说成是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呢？

既然“让步政策论”不能成立，那么，“文景之治”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西汉初期的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相继执政近四十年，历史上号称“文景之治”。的确，这是汉代地主阶级政权相对稳定和生产发展的时期。《汉书·食货志》描绘了“文景之治”时的图景：“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些话不能都信，但它多少表明在文景近四十年的统治期间，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和钱财。这个局面是怎么来的？首要的条件是秦末农民起义给了奴隶制复辟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为刘邦、吕后、刘恒、刘启推行法家路线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当然，文景二帝及法家贾谊、晁错坚持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巩固中央集权，重视农业生产，镇压搞复辟分裂的反动势力，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没有秦末的农民大起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其实，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来都明确地讲要专政，反对作为“让步政策论”思想基础的那些虚伪的“仁义道德”。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出发，他们也看到过某些阶级对立的现象。“文景之治”是地主阶级的“治世”，对于农民来说，日子仍然痛苦贫穷。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晁错就说过，当时的农民虽然“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但却过着“卖田宅，鬻（卖）妻子，以偿债者”的悲惨生活（《资治通鉴》卷十五）。就连文帝、景帝也不得不供认“民有饥色”“民食颇寡”。这就足以证明，“文景之治”只能是建筑在农民血汗基础上的地主阶级的“盛世”。“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恩格斯：《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封建地主阶级的“天堂”是建筑在农民的脊梁骨上的。“文景之治”下的地主阶级是“官家之惠，优于三代”，农民则是“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哪里有什么“让步政策”呢！

西汉初期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你死我活的两大对立阶级，谁也没有对谁让过一步。政策是有阶级性的，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果真有地主阶级统治者对农民的“让步政策”，那就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一笔勾销了。孔丘所谓“仁者爱人”，爱的只是奴隶主阶级，决不是奴隶或农民，也不是新兴地主阶级。儒家对镇压劳动人民是残酷无情的。“让步政策论”的炮制者却硬要编造对立阶级之间可以“让步”的鬼话。凭空编造这种莫须有的东西，就是要取消革命，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我们讲儒法斗争史，正是要批判这种反动观点，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剥开来看，“让步政策论”是一种尊儒反法论。“让步”者，“仁政”也，“德治”也，“礼让”也，完全是孔孟儒家商店里的货色。“让步政策论”者胡说刘邦是第一个实行了所谓“让步政策”的皇帝，实际上是把儒家“礼让”的帽子套到了法家头上。把法家的政治路线歪曲为儒家的“礼让”路线；“让步政策论”者把坚持法家路线的“文景之治”说成是“礼让”治国的样板，实际上是把法家的历史功绩偷偷地塞进了儒家的口袋。他们采取这种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法，可以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否定了法家的进步作用，又美化了儒家路线，更抹杀了劳动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我们工人在实践中体会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意义。历史的经验证明：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经常要利用、歪曲和捏造历史。刘少奇、林彪都是“让步政策论”的支持者和鼓吹者，他们竭力推销“恕道”“仁爱”一类的孔孟黑货，鼓吹什么黑“修养”，其目的是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要马克思主义向修正主义、孔孟之道“让步”，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让步”，最终是要“让”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广大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我们工人通过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我们工人决不对任何反动阶级“让步”，决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对修正主义“让步”。我们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不息，为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而战斗不息，为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而战斗不息。



批判林彪的《论短促突击》

詹立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又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映在战争指导问题上，表现为积极防御路线和消极防御路线的斗争。当时林彪站在王明错误路线一边，始则向军委写信、发电报，继则发表《论短促突击》的黑文章，支持王明的消极防御路线。“短促突击”是林彪消极防御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他后来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判《论短促突击》，对于深入清算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必要的。

“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中国工农红军刚刚诞生，国民党反动派就对它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梦想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而开始时红军只有一点小部队，如何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粉碎敌人的“围剿”，并发展壮大自己，成为当时革命斗争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出发，为党和红军制定了一条积极防御的战争指导路线和正确的作战原则。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百万工农齐踊跃”，“横扫千军如卷席”，先后粉碎了敌人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形势蒸蒸日上。但是，到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改变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五十多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并进长追”等老一套战法，采取了逐步推进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王



明推行了一条消极防御路线，既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又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法，来支持这种消极防御。在这条错误路线指导下，虽经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反“围剿”斗争仍然连连失利。红军广大指战员对王明路线吹嘘的所谓“新原则”、“新战法”，越来越产生怀疑和不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出而为王明路线呼应，抛出了《论短促突击》这篇黑文章，拼凑了二十六条实行所谓“短促突击”的具体措施，为濒临破产的消极防御路线摇旗呐喊。这是林彪积极追随王明路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历史罪证。

所谓“短促突击”，究竟是什么货色呢？按林彪自己的说法，就是在敌人所有进攻方向的城镇、大居民地、重要山头构筑防御工事，派兵固守，“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进行“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林彪这一套的中心思想，就是宣扬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同敌人进行战役、战斗的持久战和消耗战，反对毛主席关于开展运动战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他鼓吹分兵把口，用“顶”的办法对付敌人的进攻，反对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方针。一句话，就是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路线。

在强敌进攻面前，是首先实行战略退却，即诱敌深入，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然后转入战略反攻，将敌各个击破，还是分兵抵御，节节抗击，这是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一个重要分歧。

毛主席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弱小的红军，在战略防御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放进来打，就能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背上包袱；而自己则能充分发挥根据地军民的作用，使敌人到处挨打，疲劳沮丧，发生过失，暴露弱点，不断被我削弱。这样，我军就可以集中兵力，以逸待劳，寻机歼敌，实现战略反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证明，诱敌深入“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而林彪却胡说什么“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叫嚷在敌人“已经进占我们基本苏区的门户”，运用“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法”的时候，要更多地“采用短促突击的方法”去消灭敌人，“以期一举决战”。这种专以保守地方为目的的所谓“短促突击”，既不能



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又不能充分发挥根据地人民的作用，陷敌于被动不利地位。它只能部分地消耗敌人，不能大量地歼灭敌人，而自己却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因而根本无法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正是由于王明及其追随者林彪等一味地分兵抵御、短促突击，和敌人硬“顶”，结果“顶”掉了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

林彪鼓吹的诱敌深入“过时论”，纯粹是主观臆造的。毛主席正确地指出：在敌人看来，红军是他们的主要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只要红军不怕暂时丧失土地，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实行机动作战，是完全可以调动敌人，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的。而且，在第五次“围剿”中，“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不是王明路线的节节抗御，红军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敌人的堡垒主义也就不能得逞，第五次反“围剿”必将是另外一种局面。林彪鼓吹诱敌深入“过时论”，不过是为他支持王明的消极防御路线、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路线制造借口罢了。

在强敌进攻面前，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还是分兵把口打阵地战、消耗战，这是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又一个重要分歧。

毛主席历来主张，在战役、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一路，得手之后，再及其余，以各个击破敌人。实行这一方针，就能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变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和主动，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变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战斗上的外线和进攻；就能逐步地改变敌优势我劣势、敌主动我被动的态势，最后打破敌人的“围剿”。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虽然敌人的兵力数倍甚至十倍于我，但由于红军执行了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正确方针，每次歼灭一路或几路敌人之后，敌人的整个“围剿”部署就被我打乱，其余敌人只得被迫撤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竭力反对毛主席的这一正确方针。他鼓吹阵地战，反对运动战，胡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主张要派“有顽强战斗力的部队”“死守阵地”。他鼓吹分兵把口，反对集中兵力，说什么“战胜敌人时的兵力对比的少，不成为重要因素”；认为在战斗中“用不着要过大的兵力”。他鼓吹消耗战，反对歼灭战，说什么当敌人进攻时，“无论敌有无后续梯队，无论他的后续部队是否已完全脱离了敌堡的火力掩护，都应不迟疑的



开始突击”。实行这种错误的方针，我军在战役、战斗上，就不是集中兵力，而是分散兵力；不是外线，而是内线；不是主动地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使敌就我，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是以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被动地实行战役、战斗上的持久战、消耗战。这种愚蠢的作战方法，对于拥有大量兵力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而对于根据地很小，人力物力有限，武器弹药几乎都取之于敌的红军来说，则是完全不适宜的。正如毛主席所批评的那样，是乞丐向龙王比宝，完全迎合了敌人的需要，“**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王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条错误路线“**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而以“**‘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的。同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相联系，王明在战争指导上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而当冒险主义碰壁、失败之后，他就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了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消极防御路线。所谓“短促突击”，正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它的实质是被表面上其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对革命的主观力量估计不足。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林彪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在政治上表现了严重的右倾。林彪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积极支持王明的消极防御路线，是他的右倾顽症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复发。

林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右倾思想，曾经受到毛主席多次的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但是，林彪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他在政治上总是从右的方面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军事上总是捧着消极防御当法宝，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追随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配合国民党打大仗，打正规战，同时，他又继续贩卖“短促突击”的黑货。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更是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不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依然实行“短促突击”那一套，并进而炮制了以消极避战为出发点，以击溃战为指导思想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和十大军事原则。以上事实表明，“短促突击”是林彪在战略防御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他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军



事路线的理论基础；唯心论和机械论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思想根源。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是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必然反映，并突出地反映在如何研究和指导战争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指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指导战争的人，只有正确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才能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把战争引向胜利。一切战争都有它相同的情形，有它共同的规律。但是，每一个战争由于条件的不同，又都有它特殊的情形，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内进行的，又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主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情况，找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从中引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并据此制定了战争的指导路线及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毛主席的这种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林彪自吹“短促突击”是从“敌人战略战术条件，及其他（各）种主客观条件下产生的”。这是骗人的鬼话。他同王明一样，根本不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而是机械地搬运外国的战争经验，把“短促突击”视为灵丹妙药，削足适履地要中国革命战争去适应这个原则。这是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的，是违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的。

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如何创造条件，使这个矛盾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这是战争指导者必须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关于在战略防御中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就是从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如何粉碎敌人进攻、歼灭来犯敌人出发来制定的。它把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辩证地统一起来。实践证明，这是使敌之强转化为弱，我之弱转化为强，赢得反“围剿”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而王明、林彪既无视敌强我弱这一客观事实，也不懂得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转变战场上敌我强弱对比的有效方针。他们把攻防、进退绝对地对立起来，要么只讲进攻，不讲防御；要么只讲防御，不讲进攻。以“短促突击”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消极



防御路线，就是他们这种唯心论和机械论的产物。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中国革命战争只有充分动员和依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毛主席的战争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就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毛主席在谈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王明、林彪都是不相信人民、不依靠人民的历史唯心主义者。“短促突击”，实际上就是以单纯由主力红军进行的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完全否定了人民武装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取消了红军赖以战胜敌人的根本条件。这是王明、林彪等人的唯心史观在军事问题上的必然反映，也是他们把第五次反“围剿”引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当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时，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从未到有，从小到大，革命形势就如星火燎原，迅猛发展。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据统治地位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遭到极大的削弱。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重新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革命战争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深刻地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注意研究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使之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发表的军事著作，总结了党内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对历次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林彪或包括批判林彪的错误在内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批判，就包含了批判林彪的错误。因此，在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攻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刻领会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掌握批判的锐利武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批判中击中要害，进一步认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更加坚定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而奋斗。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前进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党支部

在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迎来了战斗的一九七五年。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连队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取得了一些成绩，连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斗争的实践使大家认识到，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党中央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采取的伟大战略措施。通过批林批孔，同志们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全连看书学习的空气更浓了，干部战士提高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连队的理论队伍正在成长。全连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劲，带着对帝、修、反的无比仇恨，苦练杀敌本领，加强战备，圆满地完成了卫戍警卫任务。大家高兴地说：批林批孔结硕果，路线觉悟有提高，各项工作完成好，连队一片新面貌。

回顾一年来运动发展的过程，我们体会到，要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批林批孔，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场广泛深入的革命运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运动开展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上级党委统一领导下，我们党支部不断加深批林批孔的重大意义的认识，自觉地把它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抓好这件头等大事。支部领导成员不但带头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而且经常分头深入班排，具体地领导运动。同战士们一起，调查研究，掌



握情况，有的放矢地做思想工作。在同学、同议、同批判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必须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发挥全连干部战士的积极性。批林批孔开始时，有的同志对于充分发动群众的意义认识不够明确。我们及时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学习毛主席关于“**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等教导，使大家认识到：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其罪恶目的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是林彪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要深入批林批孔，单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只有在广泛发动群众批判的基础上，才能使干部战士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和危害，清除其余毒和影响，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认识提高以后，党支部发动全连干部战士一起动脑筋，想办法，群策群力，搞好运动。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直接同群众见面；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和辅导，介绍儒法斗争的历史，干部战士都上讲台；各种形式的批判活动，指战员一齐上阵；批判的重点，思考的题目，支部、班排共同研究决定。这样，使运动搞得既比较扎实，又生动活泼。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在政治上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总是在理论上竭力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用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冒充马克思主义，妄图欺骗和吓唬群众。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需要无产阶级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抓好了这项工作，对于帮助群众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把运动引向普及、深入、持久，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指出：“**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党支部从全连挑选了政治思想好，路线斗争觉悟高，不脱离群众，肯钻研问题，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有一定表达能力，在学习和批判中能起带



头作用的十几位同志，组成理论小组，以后又不断充实、扩大。为了充分发挥他们“学习走在前，批判攻难关，思想工作是骨干，完成任务是模范”的作用，我们先后组织理论骨干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共五十四篇，写了不少心得笔记，使他们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做到批判能抓住实质，发言能谈到点上。我们又根据在斗争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的原则，在组织理论骨干同群众一起学习和批判的过程中，从事宣传、辅导工作，帮助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他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的罪行时，有的同志感到，孔老二是个教书的，没有听说他带过兵、打过仗，林彪的罪行和孔老二怎么联系？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先帮助理论骨干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然后进行辅导，使大家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论中懂得，一定的政治路线，相应地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军事路线。孔老二不但在政治上推行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而且在军事上也推行一条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路线。他从来也不是一个不问“军旅”之事的“教书先生”，而是一个双手沾满奴隶们鲜血的刽子手。孔老二、林彪虽然时代不同，但都反对革命，反对革命的正义的战争，鼓吹打败仗的蠢猪式战法，等等。干部战士听了理论骨干的辅导后反映：这样的分析，听起来明白，印象较深。

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干部战士，是帮助他们提高分析能力，搞好批林批孔的关键。一年来的实践说明，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就能使同志们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坚持，什么是修正主义的，应该批判，就能保证运动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方面，我们曾经用两个多月时间，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九篇光辉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及他在辽沈、平津战役中的罪行。全连同志在学习和批判过程中，表现了极大的积极性，写了大批学习心得和批判稿。在讨论到党与军队的关系时，对于军队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大家都明确，可是，林彪也鼓吹“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与毛主席教导



我们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有些同志一时闹不清。我们就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使大家明确了，对于林彪的谬论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揭露其本质。林彪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这一谬论和孔老二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一脉相承的，是为了愚弄人民群众，扼杀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妄图把我军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以便由他“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为实现其“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这和毛主席教导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听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听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挥，听的是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的指挥。我们这种坚强的党性观念和铁的纪律，建立在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使我们步调一致，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实践使同志们体会到：多读一遍书，多明一层理，阶级分析好，批判更深入。

我们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从我们连队的情况来看，为了使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还要作极大的努力，特别是在学习和批判方面，还要下功夫。对于林彪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批判。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毛主席指出：“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影响，要通过深入持久的批判才能肃清。正如同志们所说的，批林批孔的文件学过了，不等于完全领会了；林彪、孔老二的反动观点批过了，不等于其余毒已清除、路线是非完全划清了。我们必须继续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展望新的一年，批林批孔运动将继续深入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项



工作都将出现一个新局面。形势喜人又逼人，任务光荣又艰巨。为了跟上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搞好我们连队的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要组织全连干部战士努力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反复学好《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进一步领会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和科学分析，以更好地掌握思想武器，认清形势，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坚持作战。我们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加强党的观念和增强革命团结的论述，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拉山头，搞宗派，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分裂党和革命队伍的罪行，同一切影响革命团结、削弱革命战斗力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作坚决斗争，提高维护革命团结的自觉性，以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和伟大战略部署，巩固和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我们要深入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继续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判他反对党指挥枪，以资产阶级政治冲击、代替无产阶级政治的罪行。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领会和掌握打歼灭战的思想，深入批判林彪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批判他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通过学习和批判，进一步加强连队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前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研究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继续研究儒法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据连队的情况，我们准备进一步对西汉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晁错的《言兵事疏》、《募民实塞疏》等著作，组织力量，搞好分析、研究和译注，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做到“古为今用”。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继续批判渗透着孔孟之道和资产阶级毒素的坏书、坏戏、坏电影。在斗争中不断培养、扩大、建设革命理论队伍，使它成为带领大家长期作战的骨干力量。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我们全连干部战士有信心、有决心，再接再厉，打好批林批孔这一仗，并以批林批孔带动战备和各项工作，使连队建设更上一层楼！



为什么说荀子是法家？

唐 晓 文

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二年——二三八年），是杰出的法家。《荀子》这部著作，充分地反映了他的法家思想。在战国末期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大造舆论，“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杨倞：《荀子注·序》）为法家路线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

但是，两千多年来，荀子一直受到历史上反动派的攻击和歪曲。宋代的大儒朱熹直接攻击荀子“杂于申商”，（《朱子全书》）“不识道理”。（《朱子语类》）苏轼则诬蔑他“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苏轼文集·荀卿论》）把荀子的思想看作“异端”、“邪说”。唐代的尊孔派韩愈甚至要仿效孔老二删书的办法，“削荀氏之不合者”以“附于圣人之籍”，（《昌黎先生集·读荀》）把荀子并入以孔老二为头子的儒家营垒。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适应反动统治阶级尊儒反法的需要，否定荀子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所起的革命作用，削弱和阻止他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荀子及其思想，正确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恢复他的法家本来面目，对于深入地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很有意义的。

—

荀子成为杰出的法家思想家，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激烈斗争的必然结果。

被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的战国，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在奴隶起义和平民斗争的推动下，从战国初年开始，魏、韩、赵、



齐、楚、秦等诸侯国相继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不同程度的转化，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奴隶主阶级绝不甘心被赶出历史舞台。他们依靠各诸侯国还保留着的奴隶主势力，利用各国封建统治者还同奴隶主阶级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同地主阶级进行着拼死的争夺。他们公开用暴力手段对付进行封建改革的法家人物。魏国的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楚国的吴起被乱箭射杀，秦国的商鞅被车裂，这些残酷的历史事实，充分反映了奴隶主复辟的严重性。奴隶主复辟势力还用卑劣的手段大造反革命的舆论，疯狂地攻击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什么“贪戾好利”、“不识礼义”、“有虎狼之心”。（《战国策·魏策三》）反革命复辟急先锋孟轲，更是嚣张已极，“后车数十乘”，流窜于各诸侯国，支持反动势力复辟，梦想恢复奴隶主的“天堂”。然而，“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奴隶主势力虽然一时得势，但由于他们“权谋倾覆，以相颠倒”，违反历史潮流，违背人心所向，“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荀子·富国》）因而终究没有闹腾多少时日，就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了。

如果从战国初年的封建改革算起，到荀子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这个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夺取其政治、经济权益的斗争，已经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一幕幕流血与不流血、成功与失败的夺权斗争中，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为什么有的地方封建改革就比较彻底，而有些地方就改革不下去？这些问题迫切地要求人们给予系统的总结和正确的说明，以便为地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荀子及其弟子等法家人物的肩上。

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还面临着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当时，随着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实力的扩大，割据兼并的局面发展得更加严重了。这对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对人民也带来了极大的苦难。秦始皇后来在总结统一六国的斗争时说的“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不仅如此，诸侯国分裂割据，有利于奴隶制残余的保存，有利于奴隶主的复辟活动，这对地主阶级专政是极大的威胁。因此，结束这种状况，使“天下为一”，（《荀子·君道》）“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所在，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荀子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为实现大一统，提出和论证了富国强兵、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路线和政策。



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反对奴隶主复辟、建立封建大一统的同时，也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确立本阶级的统治地位。荀子适应这个需要，强烈反对当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的混乱局面，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中，毅然冲决儒学的罗网，从儒家营垒中杀出来，继承并发展了早期法家的光辉思想，建立起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荀子明确地把自己批判的锋芒，直指当时以儒学正统自居的思孟学派。他无情地揭露“子思、孟轲之罪”，辛辣地嘲讽子思、孟轲之流是所谓“俗儒”、“奸人之雄”，严正地指斥他们的学说是“梟乱”地主阶级“天下”的“邪说”、“奸言”，响亮地提出要以法家学说取而代之。为了使法家思想更能适合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也注意从诸子各派的学说中，继承和吸取它们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成果，来丰富和完善法家的理论，作到“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荀子·非十二子》）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

二

“法后王”还是“法先王”，革新还是守旧，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荀子概括了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运动的实践经验，批判了儒家鼓吹的“法先王”的谬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法后王”的光辉理论，这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同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立场是根本对立的。

荀子的“法后王”是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其前提的。荀子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后来者居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研究历史要立足于现实，“欲观千岁，则数今日”。（《荀子·非相》）荀子在认识论上主张“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荀子·儒效》）十分重视耳闻目睹的感觉经验，强调观察问题必须以事实作为根据。他认为“先王”的业绩十分渺茫，“文久而灭，节族（节奏）久而绝”，（《荀子·非相》）而“后王”的业绩则是“粲然”可见的。由此出发，他得出了“后王”优于“先王”，必须“审后王之道”、“法后王”的结论。他对那种“舍后王而道上古”（《荀子·非相》）的复古逆流，“不及后王”的“百家之说”，则采取坚定的反对态度。

荀子的“法后王”是当时各国变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肯定。荀子为了“审后王之道”，曾经风尘仆仆地游历了齐、楚、赵等国，了解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情况，特别是打破所谓“儒者不入秦”的惯例，毅然采取了“入秦”的革命行动，表明了他与孔孟之



徒是截然不同的。荀子入秦后，对秦国的地理、民俗、政治和朝廷的作风进行了考察。秦相国范雎问他“入秦何见”，他滔滔不绝地列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得出结论说：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肯定秦国的状况类似于“治之至”的境界。（《荀子·强国》）荀子的这个结论是很有见地的。的确，当时的秦国连续“四世”推行商鞅的法家路线，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荀子对秦国也有所批评，但是“四世有胜”的结论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荀子对当时变法较为彻底的秦国抱着最大的希望，而秦国的变法实践则成了他的“法后王”思想的现实基础。

那么，荀子心目中的“后王”究竟是怎样的呢？荀子以当时封建统治者为模特儿，塑造了他的理想之王，即“后王”。他称“后王”为“天下之君”，或“圣王”，认为一旦“圣王起”，就要对“辞辩而无统”的“奸人之雄”，即奴隶主复辟势力，加以“先诛”。（《荀子·非相》）显然，这样的“后王”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最高代表，而不能是别的。他还把“后王”看作是未来兴起的革新派，认为“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正名》）循，是述的意思。所谓“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也就是述而有作。这同孔丘所竭力标榜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的反动信条，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宋代的苏轼攻击荀子的学生李斯“事秦”，采取焚书坑儒，“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都是从荀子的“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苏轼文集·荀卿论》）的理论来的。这正说明，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就是要以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专政。荀子生前没有能够实现“法后王”的理想，但是，李斯继承了他的“法后王”思想，辅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荀子的希望在秦始皇时期终于得到了实现。

荀子“法后王”的主张，同他的“法治”思想有密切联系。在他看来，所谓“法后王”，就是要“法其法以求其统类”，（《荀子·解蔽》）即以“后王”的法为法。因此，他十分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他说：“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荀子·致士》）这就是说，“法”是达到“治”的首要环节，是封建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东西。他要求“君法明，论有常”，（《荀子·成相》）即君法要明确，为政要有一定的法度。这样，就可以“塞”奴隶主贵族之“私门”而“达”地主阶级之“公道”，就可以“才行反时者死无赦”，（《荀子·王制》）禁止和镇压那些反对地主阶级的破坏行动，使地主阶级的政权得到巩固。此外，他十分重视封建统治者



的“威”和“势”，认为封建统治者必须掌握“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荀子·致士》）朱熹攻击说：“荀卿全是申韩”，“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朱子全书》）这些话，恰从反面道出了荀子是主张“法治”的。

在战国末期社会大变动的形势下，荀子还根据他的法治思想对“礼”作了全新的解释，改变了它原来的意义，赋予它浓厚的法的内容。从荀子的思想来看，“礼”主要包括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法、道德标准，等等。有时荀子认为“礼”就是法，“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就其阶级实质来说，荀子讲的“礼”是建立在“农分田而耕”的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用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这同儒家宣扬“克己复礼”，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线。荀子认为，所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贵贱、等级的先天差别，差别是后来人们的不同的努力造成的。君子和小人、王公士大夫和庶人、天子和看门人都可以相互转化。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在这里，荀子把等级可以变化的思想同“礼义”联系在一起，既宣告了奴隶社会等级制的破产，也否定了儒家关于“礼义”的本来内容。在这个基础上，荀子强调“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荀子·王制》）以是否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作为“礼”和“刑”的标准，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儒家所维护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隶社会等级制。可见，荀子主张“隆礼”，强调地主阶级“礼”的重要性，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变革服务的，仍然是从属于他提出的“法后王”这一基本思想的。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是在同儒家“法先王”的思想作斗争中提出来的。孔丘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轲则叫嚷：“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他们高唱“法先王”的目的，就是妄图挽救和复辟奴隶制。荀子尖锐地抨击子思、孟轲之流“略法先王而足乱世”，“呼先王以欺愚者”，指出他们“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荀子·儒效》）他以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敏感，认识到子思、孟轲之流妄图通过“法先王”来达到“乱”新兴地主阶级之“世”的反动目的，因而向儒家学说射出了一支正中要害的利箭。林彪继承孔孟的衣钵，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就是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三

法家一般都是以唯物主义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荀子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为法家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荀子的“天人相分”的理论，是直接针对孔孟的“天人合一”说的。在孔孟看来，天是精神性的，有意志的，因而它能够决定人间的治乱、吉凶、生死、祸福等现象。具体地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天命的安排，奴隶们和新兴封建势力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就是违抗天命，是万万不行的。荀子有力地驳斥了这种反动谬论。一方面，他把神秘的“天”还原为物质的天，指出天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即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人们不能任意改变它的规律；另一方面他又着重指出，人的生死、富贵取决于人们能否“强本而节用”，能否遵循正确的途径办事，与“天命”根本没有关系。他还强调指出社会的治乱与“天”无关，完全是由人来决定的。要达到“天下治”的目的，必须铲除“乱”地主阶级之“世”的各种“人妖”。荀子还从“天人相分”引出了人的自然本性与后天的人为努力的区别，即所谓“性伪相分”，又从“性伪相分”直接引出“礼”和“法治”的结论。“天人相分”的原则还为新的封建等级制提供了理论前提。按照这个原则，人的血统关系和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必然联系，因此，确定人的社会地位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礼义”或者“法”。他说：“君法仪”，即以君法为准则；遵循它的就“荣”，背离它的则“辱”。（《荀子·成相》）对于社会等级的确定，荀子主张要采取“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的政策，这就否定了建立在血统关系基础上的世卿世禄制，否定了儒家的所谓“礼治”和“仁政”。另外，“天人相分”的理论引导人们从“天命”和自然界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对于新兴地主阶级能动地变革社会、发展生产起了很大鼓舞和促进作用。这清楚地表明，荀子的“天人相分”是革命的、前进的思想。

在“天人相分”的理论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这是



荀子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他的要求是“制”天、“用”天，使“天地官而万物役”，天和地各尽其职，使万物服从人的统治，而不是坐待天的恩赐，成为天的奴隶。这与孔孟鼓吹的“畏天命”、“顺天命”的谬论恰恰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反映了荀子的世界观同孔孟的反动世界观的根本对立。叛徒林彪拾起了早已被荀子批判过的孔孟的“天命论”，自比“天马”，鼓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并把它作为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完全暴露了这个反党头子的腐朽和反动。

在战国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荀子提出的关于革新、前进的光辉思想，培育出了韩非、李斯等杰出的法家，为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给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以深远的影响。但是，荀子作为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虽然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历史观上却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主张的“法治”，也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镇压。他虽然对“礼”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法治”和封建等级制的内容，但他还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儒家关于“礼”的陈腐观念。他虽然强调“法后王”，但有时也称道“先王”，以致他的思想有不够明确和矛盾的地方。因而在荀子那里，儒法两家的原则界限有时还不很清楚。这些，都反映了荀子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影响。正是由于荀子的思想存在着这种弱点，必然要被后来的儒家歪曲和利用。翻开历史，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时曾指出：“**我们的深思熟虑的马赫主义者回避研究狄慈根的每一个个别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论点，而抓着他离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地方，抓着他的模糊、混乱的地方。狄慈根会为反动哲学家们所喜欢，是因为他有某些混乱的地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还揭露马赫主义者企图利用狄慈根的弱点来创立一种路线。那些反动的儒家歪曲荀子的手法和态度不正是这样的吗？这是一个值得深省的历史教训。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荀子及其思想是不可能有什么公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不能真正认识荀子的本来面目。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会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教导，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既充分肯定法家人物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又指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正确地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些经验

赵 丰 年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这是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更加完整地提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接着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指出的一条光辉道路。

大寨，是我国农村在所有制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一面红旗。十年来，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广大农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思想革命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在更大的规模和深度上迅速向前发展。现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更加深入人心，大寨的革命精神得到广泛发扬。经过十年的实践和斗争，广大群众和各级党委对学大寨的认识不断提高，决心越来越大，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各地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在原有基础上都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大寨式的先进社队越来越多，大寨式的县不断涌现。农村中批林批孔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引起了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广大干部、群众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热气腾腾，农业生产连续十三年丰收。这一切，都大大加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发展不是偶然的。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农业战线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自力更生的坚强革命意志。斗争的实践证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农业学大寨的光辉道路，就能够不断地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做到“人变、地变、产量变”，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尽快改变农村面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把农业学大寨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怎样认识大寨？学大寨学什么？最近几年各地通过实践，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大寨以及许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经验表明，农业学大寨运动，绝不单是一个农业生产能否搞上去的问题，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农业，首先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二十多年来，大寨党支部领导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停顿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天地。大寨的经验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用社会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斗争。学大寨，我们就要象大寨那样努力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深入开展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这样，学大寨就真正学到根本上。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客观存在。资产阶级从政治思想领域、从经济领域向无产阶级的进攻，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引起他们的激烈反抗。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是否能够自觉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和资本主义倾向展开斗争。有没



有这个自觉性，学大寨的步伐大不一样。山西省有个寿阳县，与昔阳山连山，地连地，人口和昔阳一样，土地比昔阳多一倍，按理说，有这样的条件，学大寨应该很有成效。但是，由于受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县的领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口头上也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却没有认真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打击不力，结果，批不臭资本主义，就走不上学大寨的路。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当前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干部，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并利用部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私有观念，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有的社队，阶级敌人在幕后操纵，打着“发展集体生产”的旗号，诱使干部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在集体经济内部实行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妄图用资本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发动和依靠群众，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煽动的资本主义妖风，认真解决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这样一抓，干部、群众之间团结增强，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一年的时间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七四年比一九七三年粮食增产将近七成。

寿阳县的转变虽然只是开端，但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它说明批林批孔必须抓住路线问题。它说明要走大寨之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针锋相对地同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只要这样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势如破竹，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会发挥出来，不要太长的时间，面貌就可以迅速发生变化。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邪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大步”，这是大寨以及许多学大寨先进单位经验的一个生动概括。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对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抓得很紧，绝不能放松，不能停步。这一条，无论是条件较好、工作比较先进的地区，还是条件差、工作暂时比较落后的地区，都毫无例外。安徽省萧县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学大寨的步伐迈得较快，到一九七三年，改造了百分之六十的盐碱地，灌溉面积扩大三倍，粮食总产量将近翻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经有的同志看到取得成绩，放松了抓阶级斗争，想单纯抓生产。县委通过调查



研究认识到，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仍然是深入学大寨的主要障碍，必须反复地、不间断地对它开展深入的批判，才能继续前进。几年来，他们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始终抓住解决农村中方向、道路这个中心问题，联系实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做到了先进更先进。陕西省吴堡县又是一种情况。这个县地处黄土高原，到处是光秃秃的山头，发展生产的条件很困难，过去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条件很难甩掉落后帽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全县人民从一九七〇年奋起学大寨，三年大变样。他们的主要经验，也是抓批判资本主义妖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着重解决发展集体经济的方向、道路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广大群众就同社会主义贴得更紧，人心更齐，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积极性就不断高涨。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许多地方的实践，都在进一步说明，能不能把大寨的经验学到手，归根结底，是个路线问题。客观的条件经过人们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的。不是自然条件决定一切，而是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只要路线对了头，继续深入批林批孔，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不放，坚持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先进的就会持续前进，落后的也会很快赶上来。相反，路线不对头，不批林，不批孔，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批不斗，即使条件很好，也迈不开学大寨的步，走不上学大寨的路。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根子在阶级敌人那里。凡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地方，总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煽动和操纵。对他们的破坏活动要充分揭露和坚决打击。但对于少数干部和群众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则应该通过回忆对比、启发阶级觉悟、批评教育和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来解决。学大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坚持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工作应当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去进行，才能更深刻、更有成效。许多地方的经验说明，对资本主义开展批判，这是在斗争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有效的方法。广大贫下中农最热爱社会主义，最痛恨资本主义，他们都有一本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血泪史。只



要我们善于引导他们运用自己新旧社会的亲身经历，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危害性，启发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就会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识别能力就会大大增强。有了这样一支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起来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队伍，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就会及时受到揭露，资本主义活动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可以不断提高，不断前进。

我们不仅要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而且要十分重视抓好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农村，私有制延续了几千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实现农业集体化还不到二十年。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提醒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这就告诉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同时搞好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抓紧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经济领域的斗争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胜利也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去年以来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有力地批判和冲击了孔孟之道和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同时也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各级领导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湖南省茶陵县几年来认真学大寨，注意抓紧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一定成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通过总结经验，发现有一些社队的生产虽然有了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歪风并没有完全煞住，原来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又冒出来，经常出现反复。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这些地方，阶级敌人利用孔孟之道腐蚀群众，“四旧”泛滥，而领导上又没有认真去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就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发动群众联系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入批判“天命论”、“上智下愚”、“中庸之道”等谬论，批判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学大寨有了新发展。

通过这一段工作，茶陵县委深刻地体会到，要抓好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认真抓批林批孔，不破除孔孟之道和其他反动阶级用以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的风俗习惯，是不行的。孔孟之道经过历代反动阶级的精心加工，在我国传播了两千多年，形成了一种顽固的维护私有制的传统观念。阶级敌人惯于利用这



种旧的传统观念来腐蚀群众，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因此，要解决方向、道路问题，搞好生产建设，首先必须搞好思想建设，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是茶陵县以及许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一条共同体会。学大寨就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切实搞好批林批孔，这一点现在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所重视了。我们应当特别重视这方面的经验，及时加以总结，予以推广。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当前广大农村的批林批孔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正猛烈地冲击着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那部分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高涨。领导的思想怎样跟上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从大寨、昔阳以及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看，首要的还是要不断提高各级干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党的基本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总纲。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最根本的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抓住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证明，抓革命，促生产，社会主义农业就得到发展；就生产抓生产，终不免要走到邪路上去。同时，我们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农村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这些政策是保证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不要以感想代替政策。要记住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在几亿农民学大寨的伟大的群众运动面前，各级领导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认识。

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就是要有雄心壮志，敢想、敢干。要大于社会主义，不要做安于现状的维持派。要发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树立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气魄，既有明确的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和规划，又要脚踏实地，付出艰苦的劳动。我们必须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要切实深入第一线去蹲点调查，同群众一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努力取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以路线为纲学大庆

田 志 松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这场深刻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推动着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也推动着工业学大庆运动蓬勃向前发展。

一九六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指明了在工业交通战线上，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

大庆，是按照“鞍钢宪法”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典型，是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典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为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九七四年，天津市工交战线上的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在批林批孔中坚持工业学大庆，使革命步步深入，生产蒸蒸日上。这一年，是天津市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的一年，是广大职工精神面貌深刻变化的一年，也是天津市历史上工业生产水平最高的一年。

工业学大庆，最根本的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工厂企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其中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厂企业里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这种斗争，贯穿在企业工作的各个方面。“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只有象大庆那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



主义革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生产和技术，才能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批林批孔，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职工紧密联系企业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大大提高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也加深了对大庆的根本经验的认识。过去，有些单位把大庆单纯当作是“生产典型”，片面地认为学大庆仅仅是把生产搞上去，“生产紧了想大庆，遇到困难喊大庆，完成任务忘大庆”，往往学不到根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认识到，经济领域的斗争，处处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业建设问题，归根到底是个路线问题。不是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执行错误的路线。离开党的基本路线，不从方向、路线上学大庆，不但学不好，还有可能滑到邪路上去。认识提高以后，许多企业学会抓路线了。不仅党委抓路线，业务部门也抓路线；不仅领导干部管路线，群众也管路线，使企业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天津重型机器厂的一年巨变，充分说明了抓路线对于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决定作用。这个厂原来是一个后进单位，过去就生产抓生产，开了多少次专业会议，订了一大堆规章制度，工人意见不少，生产仍然没有起色。党的十大以来，厂党委提高了抓大事的自觉性。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调动起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企业面貌焕然一新。一九七四年，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全年的总产值计划，比一九七三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九。

究竟是就生产抓生产，还是抓革命促生产，反映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革命和生产，总是前者统帅后者，推动后者，两者的关系不能颠倒。但是，过去有些同志常常在这个问题上摆来摆去。政治运动的时间一长，生产任务一忙，就放松革命，单纯抓生产去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级党委反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批判了林彪破



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的罪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看到广大职工对林彪、孔老二口诛笔伐，开了那么多批判会，写了那么多文章，研究了那么多历史和现实的材料，生产不仅没受影响，反而上得很快。大家更加体会到，要搞好生产，最根本的是把革命搞好。革命搞好了，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使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群众觉悟提高了，精神力量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现在，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谬论，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批判。彻底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更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还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推进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办企业依靠谁？是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是依靠少数人，实行专家路线，历来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斗争的焦点。大庆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首先要坚定地相信群众是要革命的，是有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强烈愿望的。过去，有些企业的领导人，总是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整天“掰着指头算家底，拍着脑门想困难，打着算盘抠产值”，结论是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批判了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观”、“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进一步解除了束缚头脑的精神枷锁，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当家作主的革命责任感。同时，对那些只相信专家、不相信群众的干部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来了一个大扫除。多数人觉悟起来了，深刻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一个伟大真理。精神状态一变，信心也强了，决心也大了，办法也多了，许多长年解决不了的问题迎刃而解。天津市有一家造纸厂，建厂以来就有两个“老大难”问题，一是玻璃纸发粘、发脆，



一是铜版纸赔钱。厂领导曾经三请专家，但一事无成。通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他们总结了历史经验，认识到这两个“老大难”问题所以长期解决不了，主要原因是没有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于是，就把问题交给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几个月，就解决了多少年没解决的问题。一九七四年，这个厂玻璃纸的一等品率比前年提高了百分之十，铜版纸成本大幅度降低，并提前两个多月完成国家计划。实践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依靠群众，就无往而不胜。

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是开展工业学大庆的一项重要内容。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职工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孔老二复辟、倒退的谬论和刘少奇、林彪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使群众的聪明才智象火山一样迸发了出来。广大工人群众发扬大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攻克一个个难关，攀登一座座高峰。过去几年搞不成的项目，现在搞成了；过去不敢想、不敢搞的项目，搞出来了。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形成了一批新的综合生产能力，为生产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天津自行车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组织了三次大会战，实现了二十项比较重大的技术革新，建成震动镀锌自动线等十条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生产线，自行车产量由一九七三年的八十七万辆提高到一九七四年的一百万辆。他们的体会是：生产条件变不变，决定于路线对不对，企业变是从人的思想变开始的。抓好批林批孔，路线对头了，人的思想面貌变了，生产条件就会变，企业面貌就会变。

加强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是开展工业学大庆的一个重要条件。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大力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把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



矛盾”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项，并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毛主席这一深刻的科学分析，引导我们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促进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大大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队伍的侵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着重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地方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注意加强工人队伍的团结，带领群众，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林彪、孔老二。对少数不批林，不批孔，热衷于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对于工人群众中的某些意见分歧，实行“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断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则给予坚决的打击。由于路线是非分得清，两类矛盾处理得当，千百万工人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保证了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的胜利开展。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要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必须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业学大庆，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件大事，不能只交给生产部门去管，必须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经常讨论研究，统一安排部署。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实行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党委首先要认真看书学习，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在开展工业学大庆的过程中，也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这就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让各种意见都摆到桌面上来，经过充分的讨论，达到统一认识。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的时候，有的同志对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的关系认识不清，有顾虑。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党中央的指示，他们很快地认清了批林批孔的性质、目的和意义，解除了思想顾虑，摆正了两者的关系，从而加强了对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领导。

工业学大庆既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然要遇到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旧思想的干扰。在斗争面前，各级领导需要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和无产阶级党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敢于领导，敢于斗争，才能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通过批林批孔，深刻地批判了林彪和孔老二鼓吹的“中庸之道”，对于克服一些企业领导干部对敌人不敢斗、对错误倾向不敢批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广大干部带领群众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大力表扬学大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热情支持和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认真总结和推广学大庆的新鲜经验，使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领导班子必须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才能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经验证明，那里的领导班子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以身作则，带头干社会主义，那里革命和生产就搞得好；那里的领导班子没有摆脱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甘当口头革命派，高高在上，脱离群众，那里的革命和生产就搞不好。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党委在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的过程中，注意搞好机关革命化，取得了有益的经验。他们坚持学大庆的“三个面向”（面向基层、群众、生产），“五到现场”（政治工作、生产指挥、设计工作、后勤供应、生活服务到现场），经常深入革命和生产第一线和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这样，不仅改变了干部的精神面貌，密切了干群之间、上下之间的关系，而且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快更好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及时发现和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有效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坚持工业学大庆，取得了一些新经验，也对企业领导工作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在一九七五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习，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搞好批林批孔，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制 订 规 划 乘 胜 前 进

河北遵化县沙石峪大队党支部

战斗的一九七四年过去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沙石峪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生机勃勃，欣欣向荣。我们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批林批孔，团结战斗，推动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干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农业生产又有新的增长。粮食产量在一九七三年亩产八百多斤、总产六十一万八千斤的基础上，达到亩产九百多斤、总产七十万斤，增长了百分之十三。收获干鲜果品二十八万斤，植树造林二万多棵。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丰收之后，紧接着又掀起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我们党支部广泛发动群众，对一九七四年的革命和生产进行了总结，表扬了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的大量新人新事新风尚，并讨论了在新的一年里如何继续前进。从总结工作入手，党支部进行了开门整风。在总结、讨论中，干部和群众鼓干劲，找差距，订规划，提措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家高兴地说，千好万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千对万对，最根本的是路线对。路线对头了，就能站得高，看得远，产量越增越找差距，越鼓干劲。一九七五年是我国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沙石峪的贫下中农，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大寨为榜样，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万里继续走，千担接着挑，总结经验，乘胜前进。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认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集中精力抓好这个头等大事。批林批孔运动，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强大推动力。在农村，继续抓好批林批孔，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才能不断扫除农业学大寨的障碍，推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有人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我们沙石峪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事实上这种斗争过去没有停止过，今后也将继续存在。特别是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资本主义倾向往往就会抬头。一九七一年一场大风把十几万斤水果刮落，几百棵果树连



根拔，接着又是几十天的卡脖子旱，有人就提出把移山造田的建设工程停下来，派队里的马车搞运输、抓现钱。一九七二年严重干旱，秋天一场大风又摇落了一万多斤苹果，有人主张不送国家收购站，自己运到唐山附近多卖钱。接着又有人反对用拖拉机拉沙子改土扩种小麦，主张拉脚搞运输。我们抓住这些事实，在领导班子内部，在党员、团员和社员中，开展了持续二十多天的大辩论，分清了路线是非，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怎么能说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当然，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单位，斗争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断巩固和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的特点会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存在则是共同的。我们只有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来观察、分析问题，才能适应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不管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怎么变化，都能识破它，胜利地同它斗争。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经过批林批孔，我们对这一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我们看到，古往今来，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派，都是主张复辟、倒退，反对革命、前进的。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在我国才建立二十多年，不可能把几千年私有制遗留下来的旧思想一下子清除干净。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离开无产阶级世界观，就会陷入资产阶级世界观，只想自己就会忘了集体，不想社会主义就会想资本主义。不从私有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的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和做法也就不一样了。过去有的人热心于跑自由市场，那时我们只看到跑自由市场影响集体生产，没有想到它对人们思想的腐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识有了提高：多卖几个钱，少出几个工，这还是小事；越跑越和私有观念亲热，越跑越和社会主义疏远，这可是大事。大事就要抓，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绝大多数社员提高了认识，自己院里产的果子也自觉地卖给了国家。他们说，这样才能和私有观念决裂。这说明，只有不断地抓路线，抓大事，抓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排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干扰，抵制旧的传统观念的腐蚀，才能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上来，团结战斗去争取胜利。如果放任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泛滥，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人心就要被搅散，思想就要被搞乱，歪门邪道就有了市场。搞社会主义，不光要把穷山搬走，更重要的是要把剥削阶级旧的传统观念挖掉。移山先移旧思想。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住两条道路的斗争，搞好批林批孔，这是坚持大寨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项根本思想建设，是用马克思主



义占领整个农村阵地的百年大计。

我们党支部对怎样搞好一九七五年的批林批孔进行了研究，准备抓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要认真组织党员和群众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只有掌握好思想武器，才能紧密联系现实斗争，深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要搞好学习和批判，就要继续抓好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建设，坚持办好政治夜校。二是发动群众坚持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向各种旧的传统观念展开进攻。要巩固业余文艺宣传队，办好图书室，广泛开展学唱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创作革命诗歌等活动，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把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占领起来，巩固下去。三是党支部领导成员要走在运动的前头，带头学习，带头批判，带头联系实际，带头参加革命文化活动。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改造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及时跟上形势的发展，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批林批孔为动力，以大寨为榜样，鼓足干劲，大搞以水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和正在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源源不绝地调动起来。对于群众的这种积极性，要有充分的估计，要善于组织和引导。在一九七五年，我们准备集中力量搞好三项农业基本建设工程。一是在山腰上修建一条十里长的环山大干渠，把我们沙石峪的九岭十七沟串起来，把全村的机井、水池连起来，把原有的支、斗、毛渠通起来，使全村形成一个水利网。要求达到渠里有水，渠旁有路，路旁有树。这条干渠修成后，用来排洪可通过一个流量的洪水，用来蓄水可蓄五千多立方，做到雨大可以排洪、拦洪，雨小可以蓄水浇地，无雨可以把地下水集中起来，调节使用。这样，可以使水渠以下的四百亩果园和千亩农田高产稳产，既能得到适时的灌溉，又能免除山洪的威胁。二是继续大搞山地改造，为一九七六年实现山村机械化和水利化打下基础。一九七五年先搞四百亩，明年再搞四百亩。要挖掉埋在地里的“卧牛石”，搬走全部“田中山”，土层加厚到一尺二寸以上，做到浇地不跑水，山地梯田能跑拖拉机。三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新建一个大队集体养猪场，使肥源紧紧跟上。这三项工程的土石方的总量，相当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工程量的总和；如果和我们大队第一个十年规划比，比整个规划的工程量还大。



在讨论这个方案的时候，和过去一样，我们又跟右倾保守思想和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世界观进行了斗争。为什么还有这种斗争呢？这不奇怪。先进和落后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愚公就有智叟。这次“智叟”不说青石板种不了地，石头缝里栽不活树了，也不说山洞打不通，沙石峪打不了井了，因为这些都已变成了现实。而是说，沙石峪地改了，井打了，青石板上高产了，长城脚下的山地打出了江南粮，保住这个成绩就行了，还大干，干到啥时候是个头。广大群众回答他们：干革命只有起点没有头，到了头还咋前进呢？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我们已经干了两个十年，工程一年比一年增多，经验一年比一年丰富，思想一年比一年提高，可以比过去干得更好。革命要求我们乘胜前进，而不能停止不前。也许有人担心，干这么大的工程会不会影响当年生产？我们说，这里是有矛盾，但是只要群众起来了，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群策群力，合理安排，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在讨论规划时，大家说：要象大寨那样，大打人民战争，把群众运动和专业队伍结合起来。在封冻前主要抓清理水渠和猪圈的地基，把四百亩地内的“卧牛石”、“田中山”亮出地面。在封冻后解冻前大搞采石、运沙的备料活动，以及爆破地里已经亮出的“卧牛石”、“田中山”。大地逢春解冻后，把绝大部分劳力投入春耕春种，组织专业队继续修渠、筑路。改土要不误春播，修渠要修一段，成一段，用一段，在秋季种麦前全部完工，解决当年受益的问题。经过前一段的奋战，现在，水渠、猪圈的地基即将清完，凿石、运土、拉沙等备料活动正在紧张进行。沙石峪的山上、地里，到处是一片人欢马叫、热火朝天的景象。群众的决心和干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既要看到工程量的增加，更要看到人的变化，群众觉悟了，经验丰富了，就应该也能够越干越大、越干越快、越干越好。

在下苦功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对于搞好科学种田，充分发挥现有工程设施的作用问题，也不能忽视。我们沙石峪过去是“粒土如珍珠，滴水贵如油”的地方，现在生产条件得到了改造，地块大了，土层厚了，可以引水上山了，产量上去了。可是，土和水的利用率都还不够高。几年来，我们大搞科学种田，坚持不懂就学，学了就试验，试验成功就推广，已经把一种一收改为两种两收。山地、果树下的冬小麦经过三年试种，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了五百斤。一九七五年，对于种植、管理和培育优良品种等方面的试验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在合理用水和节约用水上，要继续搞好喷灌试验，使现有的水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想，工业上



可以不断挖掘潜力，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设备、投资，增加生产，农业上同样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生产条件，不断挖掘潜力多打粮。只要我们坚持和旧的习惯势力斗，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斗，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学习大寨科学种田的经验，“穷棒子”精神不丢，“愚公移山”的斗志不减，就一定可以办到。

我们还本着“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根据我们这里有山有石头的特点，安排了一九七五年林业、畜牧业和砸石渣等副业生产。并且准备用副业收入购买两台手扶拖拉机，做到以副养机，以机促农，努力加速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的更大发展。

当前的大好形势，对我们党支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继续抓好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一是要坚持斗争哲学，深入开展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前几年，在领导群众学大寨的过程中，就不断遇到右倾保守思想的阻拦和进攻，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领导班子内部的反映。由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展开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斗争中求得了团结，在斗争中获得了提高。今后这种斗争仍然会继续存在。尽管斗争的形式可能会变化，但斗争的内容无非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规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象大寨大队那样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敢亮、敢斗，一抓到底。二是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曾有一度我们想，干部总归是干部，干部的责任就是想办法、出道道，总觉得想出一个好点子来比跟班劳动还顶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跟刘少奇、林彪鼓吹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一对号，才明白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它说明我们头脑里仍然残存着把劳动分成等级的旧传统观念。因此，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种种轻视体力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谬论，提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三是改进领导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包队蹲点，不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不搞瞎指挥，脚踏实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尽力把问题解决在田间和炕头。同时还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保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四是坚持开门整风，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与建议，接受群众监督，反骄破满，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断地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带领群众乘胜前进。



依靠工人群众办好企业

上海手表厂党委会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热潮里，我们满怀信心地迎来了一九七五年。

在我们厂里，依靠工人群众办好企业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得到了发挥，全厂到处热气腾腾。一九七四年，我们在连年增产的基础上，又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手表总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六点一，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百分之六点六。现在一个厂的手表产量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三个厂还要多。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我们还以一年的时间做好了以往需要两年、三年才能做好的新产品转产的准备工作，使今年能够比较顺利地按照新的结构生产新的手表。手表的质量也稳定提高，走时误差方面已从二级表上升到一级表的水平。

这一年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只要我们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的企业就会愈办愈好，进一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不是依靠工人群众来办企业，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根本不同的办企业路线。我们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广大职工认识到，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一定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建立起技术民主、计划民主、管理民主等一系列依靠群众管理企业的制度。在党的领导下，群众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对待各项工作，企业的面貌日新月异，生产也持续上升。但是，曾经批判过的旧思想、旧作风，仍然会不时地在一部分干部身上反映出来：工作顺利的时候，喜欢搞“一言堂”，不愿深入听取群众意见；工作困难的时候，看群众的落后面多，看积极因素少。有的同志甚至一有机会就想把物质刺激和管卡压的一套重新搬出来。这种情况说明，不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企业管理仍然有走到邪路上去的危险。

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厂工人群众在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上智下愚”



等反动谬论时，联系实际，揭露了厂党委在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我们就群众意见较多的一些事情，分别召开了讨论会、座谈会、辩论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些根本道理。思想路线端正了，企业管理就有了明显的进步。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比往年多，遇事注意同群众商量。企业管理制度上过于繁琐、办事机构不够精简等缺点也得到了纠正。一九七四年，为准备一九七五年转产新结构的手表，要搞好两千多套工艺装备，任务很重。但是，由于充分依靠群众，发扬管理民主和技术民主，这项工作不仅做得快，质量也好。回顾这一年的工作，大家深有体会地说：“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扫除了孔孟之道的流毒，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就发扬得更充分了。”

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一定要发扬先进。群众中最积极的一部分力量得到领导的支持，无产阶级正气就会发扬起来。群众心情舒畅，工作就会生气勃勃。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群众中的新生事物不仅先进的单位有，在后进的单位也有。如果对于这些新生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发现了也不大力扶植，任其自生自灭，那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积极因素也可能变成消极因素。我们厂生产表盖、表壳的冲压车间，生产条件比较差，劳动强度高，长期以来是全厂的一个薄弱环节。过去，其他车间生产上去了，表盖、表壳跟不上，常常是“赤膊机心等衣穿”。对于这个车间，以前我们有些同志总是埋怨指责多，认为那里群众落后。其实，恰恰在这个车间里，就有不少先进的事例。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正是这个车间的工人贴出了“我们工人不仅要管生产，还要管路线”的大字报，列举了不少典型事例，批评领导没有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张大字报尖锐泼辣，旗帜鲜明，有分析，有说服力。它生动地说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是群众落后，而是我们领导的思想落后，看不到群众中的先进事物。我们抓住这个先进事例，在全厂大加表扬，群众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往年，这个车间一讲到增产，有的干部就伸手要人、要设备。现在，这个车间不仅批林批孔搞得比较好，技术革新项目也实现得多，已经成为全厂比较先进的车间。这些事实对我们教育很大。为了使群众中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普遍推广，我们经常运用现场会、出简报等形式，表扬那些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好的部门、小组和个人，使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和先进事物得到推广，这对我们厂的革命和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群众中先进的要发扬，对于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又应该怎样看待呢？有些群众暂时处于落后状态，主要是由于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较深，觉悟不高，还缺乏当家做主的自觉性。对于这部分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的群众，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逐步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坚定地相信他们是有可能转化为先进的。要是认为对这一部分人不能依靠，只能搞管、卡、压，或者只能靠物质刺激解决问题，那就实际上把自己放到群众的对立面上了。批林批孔运动以前，我们就有过这种教训。有少数新进厂的青年，自由散漫，劳动纪律比较松弛。个别车间的干部就采取比较简单生硬的办法，虽然一心想把劳动纪律整顿好，可是效果却不好，问题得不到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人群众对此提出了批评，有些干部却思想不通。工人说，问题是究竟怎样管法？是靠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是靠简单的压服的办法？是依靠广大群众去帮助提高少数人的觉悟，还是靠少数干部去“管”人？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从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提高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老工人结合回忆对比，讲了规定劳动时间为八小时的来历，说明这是革命斗争胜利的成果之一。过去资本家为了加紧剥削工人，劳动时间常常要十小时、十二小时以至十四小时以上。许多工人失业，找不到工作，饥寒交迫，被逼死的不知多少。还要进一步看到，今天我们的劳动和过去根本不同，不再是替资本家劳动，而是为革命，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劳动，这既是工人阶级的责任，也是工人阶级的权利，我们要珍惜劳动时间，争取为革命多作贡献。这种讨论，生动活泼，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效果很好。原来不遵守劳动纪律的一些青年，一年来大有进步，有的成了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骨干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有的参加了车间的理论小组，有的还入了团。

为了做到充分的依靠群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工作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既充分发动群众，又加强党的领导，才能造成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也存在一些糊涂观念。他们往往把依靠群众和加强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或者是一讲加强党的领导，就忽视依靠群众，怕搞不好会影响产品质量；或者是一强调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就不敢领导，群众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两种情况，都是片面的、错误的，都不能达到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目的。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的统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厂广大群众发扬了当家作主的思想，实行管理民主、计划民主、技术民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项工作搞得更加生动活泼。工人和干部在生产技术上一出现不同意见，就组织讨论会和技术辩论会。这样，就使我们基层党组织能够集中群众正确意见，做好工作。厂里有的分工管生产的干部，由于怕犯以生产压革命的错误，不敢抓生产，缩手缩脚。工人看到这种情况后，就主动找领导谈心，写思想评论，有的还敲锣打鼓到厂党委请战，要求各级领导把各项工作切实抓起来。事实有力说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就会使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组织来实现的。我们企业的党组织要实现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就要善于把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向群众宣传解释，使党的路线、政策化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有个车间党支部书记，由于脱离群众，贴了他很多大字报，有的还要求党委宣布让这个干部靠边站。对于群众的这个要求，怎么办？我们认真作了研究，觉得批林批孔应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林彪和孔老二。这个支部书记是有缺点、错误，应该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但是，他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他应该坚持以教育为主。我们和部分对这个干部意见较大的工人群众谈心，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教导。通过学习，大家认为对这样的干部，还是应该让他在斗争中接受教育，提高认识，不应该叫他靠边站。后来这个干部对自己的错误也作了检查，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同群众团结在一起，共同批林批孔。群众对这样处理都比较满意。这件事也使我们体会到，只有把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交给群众，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真正形成。

当前，我们厂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生动表现，也是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所取得的成果。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一九七四年第四季度，我们发动群众，讨论制订了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〇年的远景规划。全厂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认真总结依靠群众办好企业的经验，在新的一年里，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党的基本路线指引我们胜利向前

辽宁营口市水源公社党委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水源人民公社深入开展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全公社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公社地处辽河下游。解放前，这里是个十年九涝的穷地方。“种地不打粮，年年去逃荒，财主喝人血，穷人饿断肠”，就是旧社会这儿农村的真实写照。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水源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更加坚定了干社会主义的决心，更深入广泛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公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我们公社筑起了一道六十多里长的防洪大堤，结束了长期以来辽河造成的灾害；五十一座电力排灌站和总长一千七百四十多里的排灌渠道，组成了沟渠相连、排灌自如的水利网。开垦荒地，排除盐碱，修成了七万六千多亩平展展的大条田。全公社现有大中型拖拉机五十二台、载重汽车十二辆和许多其它农业机械，翻地、脱粒、碾米等实现了机械化。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一九六八年全公社粮食平均亩产过“长江”，一九七一年增加到九百七十斤，一九七三年达到了一千零二十八斤。这一年向国家交售粮食四千八百万斤，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总产量，平均每人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一千二百八十斤。一九七四年虽然多灾，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一九七三年。林、牧、副、渔和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壮大，公共积累一千四百万元，集体储备粮一千二百万斤，社员生活逐年提高。广大贫下中农说：“水源，水源，咱们饮水要思源，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斗争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



农村的主要矛盾。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充分认识在走什么道路问题上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复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大家齐心干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可是，一九七二年的一段时间，在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时，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有的人在道路问题上又转了向，个别队出现了副业单干、“工分挂帅”的苗头。有一个大队，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黑货，打击了阶级敌人，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粮食平均亩产由原来的四、五百斤一跃跨过了“长江”。但在一九七二年，由于没有抓紧两条道路斗争，资本主义倾向抬头，影响了集体生产，粮食平均亩产又有下降。这个大队的干部群众，通过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端正了社会主义方向，一九七三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八百八十多斤。

阶级斗争的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有的人又拣了回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最根本的应该抓什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紧密联系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回顾了我们自己这个公社从建国以来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始终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每一次斗争都是围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大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但是，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刻企图变天。同时，农村也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如果我们对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认识不清，稍微放松了阶级斗争，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资本主义就会泛滥起来，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通过学习和联系阶级斗争实际，同志们深刻认识到，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只有抓住两条道路的斗争，才抓到了根本上。

几年来，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作为一项经常



性的任务来抓，不断地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我们在全公社树立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先进典型，抓了后进单位的转化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生动具体的路线教育；经常分析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和动向，开展革命大批判，做到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就打击，资本主义倾向抬头就批判，出现歪风邪气就斗争。我们不断研究和总结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些规律和特点，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打主动仗。当斗争胜利和农业获得丰收的时候，注意不忘乎所以，想到斗争的长期性，坚持继续战斗；当农业遭受灾害或我们纠正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时，注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势力抬头。这样做的结果，提高了干部群众抵制资本主义倾向的自觉性，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表现在多方面，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随着我们公社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在集体经济的某些方面反映出来。比如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还是搞“重副轻农”；在发展社队“五小”工业中，是坚持首先为农业生产服务，还是只图赚钱；在分配问题上，是不是兼顾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在实行“厂社挂钩”中，是不是从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出发。在这些问题上，如果不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就容易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例如有人说：“只要为集体，咋干都有理。”正说明了他们划不清在发展集体经济中的两条道路的界限。

为了向干部群众进行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在发展集体经济中两条道路的界限，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解剖了两个典型。有一个生产队，一九七二年个别干部以“增加集体收入”为理由，把强劳动力拉去搞“挣钱”副业。结果，不但总收入没有增加，而且水稻亩产由上一年的九百三十斤下降到七百五十斤。一九七三年，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他们批判了“重副轻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使干部群众分清了路线是非，集中主要力量搞农业，并因地制宜地发展副业生产，水稻亩产超千斤，社员收入显著增加。还有一个队的农业机械修配厂，不为农业生产服务，坏人乘机钻进来破坏，使这个厂走上了斜路。后来，他们吸取教训，端正办厂方向，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这两个事例中，大



家看到，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同样有一个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表面上说是“为集体”，实际上给阶级敌人煽动资本主义造成了机会。为了使集体经济更好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我们经常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爱国家、爱集体的教育，进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教育。生产队比较重要的经济活动，都事先交给社员讨论，看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发现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就进行批评和抵制。他们说：“该干不该干，先看路线。”去年夏锄大忙时，有个生产队的个别干部，想要组织一些人进城搞包工，群众发现这是走偏了方向，立即提出批评，加以制止。

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有它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的。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深挖产生资本主义倾向的思想根子，深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孔孟之道，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几年来，由于生产不断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壮大，社员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就在这种比较富裕了的情况下，个别干部和社员滋长了满足现状、贪图安逸的情绪，开始讲阔气、讲排场，艰苦奋斗的精神有所减弱。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宣扬什么“人生在世，吃穿二字”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妄图从思想上腐蚀、毒害人们。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进一步认识到，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很大的破坏力。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非抓好不可。如果我们不去抓，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不能巩固。我们便组织干部和群众，深入批判孔老二的“小人喻于利”等谬论，批判“人生在世，吃穿二字”的剥削阶级思想。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某些错误倾向，反复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艰苦奋斗的教育，经常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引导大家时刻不忘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不忘合作化初期的艰苦创业精神。思想上的革命，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年冬天以来，全公社出动了五千多名劳动力，在长达五十多里的引水干渠上，冒着严寒，进行彻底改造原有排灌渠系的战斗，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学习了天津市小靳庄的经验，进一步整顿了坚持多年的家庭、院落学习班，各大队普遍建立了政治夜校，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



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我们发动群众反复深入地批判了封建宗族观念、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中庸之道、听天由命等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并在斗争中建立了一支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成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骨干力量。各大队都办起了文化室，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学唱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这样，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立社会主义思想，兴社会主义新风，干社会主义大业，越来越成为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自觉行动。

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和抵制资本主义倾向，关键是领导班子带头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此，首先要抓好领导班子自身的学习，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增强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一九七三年秋收分配时，公社党委通过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认识到拉萨尔鼓吹“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谬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不剥削工人就活不下去，工人哪会有“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需要留出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公共福利事业，也不可能全部分配给个人。同志们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更加自觉地引导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许多同志深有感受地说：“不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就会忙忙碌碌走错路；只有认真看书学习，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转向。”如今，公社党委和各大队党支部，坚持看书学习已经成为制度。我们还举办学习班，分期轮训干部和党员，一九七四年办了十期，培训了七百多人。我们每年都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结合政治运动和年终工作总结，进行开门整风，围绕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揭露矛盾，总结经验教训，并发动群众评论党支部和党员。通过这些措施，加强了党的建设，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朝气蓬勃，团结战斗，带领广大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大道阔步前进。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建设新农村

江苏邳县丁楼大队党支部

我们丁楼大队地处苏北老沂河畔。解放前，沂河多次决口泛滥，把全村的土地冲成七沟八洼一片沙荒。沙荒占土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庄稼扎不下根，立不住苗，好年景亩产不过百斤粮。解放以后，我们大队的农业生产有了一些发展；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干部群众心不齐，集体经济发展缓慢，落后面貌没有能够迅速改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干部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增强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干社会主义，走**农业学大寨**的道路，奋战几个冬春，用翻土埋沙的办法，把一千四百亩沙荒翻了个个，初步改变了生产条件，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上升。一九六九年亩产上《纲要》，一九七〇年过“长江”，一九七四年战胜了特大洪涝灾害，在连续三年超千斤的基础上，亩产达到一千五百斤，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七倍，总产增加四倍半。去年交售给国家粮食六十八万斤，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最高年产量。几年来，棉花、油料等多种经营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现有公共积累五十余万元，添置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九十九台，基本上实现了耕作、脱粒、运输和农副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我们大队面貌变化的事实，生动地说明，只有加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才能抵制和排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同时，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干部群众才会在共同的目标下不断增强革命团结，发挥出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主观上也想带领群众改变丁楼面貌。但是，在困难面前总是怨天尤人，一怨群众心不齐，捏不到一块；二怨自然条件差，沙层太厚面积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对我们提出了批评，他们尖锐地指出：“你们被沙子迷住了眼睛，看不清方向路线，五个指头捏不拢，怎么领导大家去改变面貌呢？”贫下中农的批评对我们触动很大。我们总结



过去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支部领导班子中的同志没有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正确。例如；有的同志对发展农业生产应走什么道路认识不清，主张弃农经商，大搞副业，多抓钱，解决一时困难；有的同志受“中庸之道”的影响，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不抵制、不斗争；有的同志阶级斗争观念淡薄，对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缺乏警惕，甚至受骗上当。这样，支部领导成员的思想不一致，步调不整齐，团结搞不好，拳头握不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联系斗争的实际，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只有坚持斗争哲学，不断清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时刻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阴谋，才能使支部领导班子的革命团结经得住斗争的考验。领导班子团结紧了，有一个坚强的核心，才能够带领广大群众去战斗，夺取革命和生产的胜利。

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经常围绕方向、道路问题，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清是非，求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团结。比如，在改造沙荒时，有个支委思想上存在怕苦畏难情绪，错误地认为深翻一亩沙荒，要挖千把个土方，花工大，不划算，对翻沙造田持消极态度。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乘机对他进行拉拢腐蚀，煽动资本主义妖风。这个支委在阶级敌人的拉拢下，一时分不清路线是非，也跟着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大家对他进行批评帮助，他反而埋怨支部对他不支持，因而影响了团结，削弱了党支部的战斗。我们抓住这一事关路线的问题，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同时在支部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终于使这个支委辨明了方向，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其他支委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近几年来，我们比较注意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以促进革命团结的加强。我们坚持了看书学习的制度，大家克服文化低、工作忙等困难，努力学习，再忙再累，从不间断。坚持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认真改造世界观。一九七四年，平均每个支委参加劳动二百六十四天。坚持了开门整风制度，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支部领导成员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原则问题不让步，小事不纠缠，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正确。这



样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革命团结也更紧密了。

在农村，我们讲团结，十分重要的是搞好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的团结。贫下中农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只有搞好贫下中农本身的团结，才能把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党支部在促进贫下中农团结方面，首先注意抓好阶级教育。过去，我们大队贫下中农中间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封建宗族观念的影响。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百分之八十以上姓丁，过去姓丁的当中又分七房八支。解放前，地主、富农掌握着封建族权，他们在反动政权的庇护下，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贫下中农。解放后，地主、富农被打倒了，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妄想变天复辟。他们的手法之一就是散布封建宗族观念，挑拨和破坏贫下中农的团结。去年夏天，六队社员推选一个共产党员担任生产队长，有个反革命分子利用“近房”关系，拉拢他说：“亲不亲，房头分”，“猪蹄子煮一百滚还得朝里弯”，企图搅乱阶级阵线。生产队长觉察到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便组织贫下中农，联系本队实际，开展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在会上，队长带头忆自己的苦难家史，揭发批判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团结的罪行。在旧社会，他的父亲在那个反革命分子家里扛了十二年长工，一个工钱没拿到，一次运高粱秸时翻了车，轧断了胳膊，地主不仅不给治疗，还把他赶出门外。许多活生生的事实，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在阶级社会里，人是以阶级划分的，贫下中农才真正是一家人。阶级敌人利用封建家族关系，来掩盖和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妄图让我们忘记阶级苦、血泪仇，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我们决不能上当。这个队抓紧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增强了贫下中农的团结，干群一股劲，很快由后进队变成了先进队。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林彪、孔老二的谬论和本大队的阶级敌人散布的“家族亲”等反动言论结合起来批判，不断清除封建宗法思想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的影响，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在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的基础上，全队贫下中农绝大多数都能从革命利益出发，积极维护革命团结。过去，有些人因家族矛盾隔阂很深，成了冤家对头；现在，团结战斗，变成互帮互学的阶级弟兄。过去，选干部讲同姓，讲“近房”；现在，讲党性，讲政治表现，把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人推选上领导岗位。过去，宗族关系



常常掩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现在，阶级敌人一有破坏捣乱，不管“房头”多近，贫下中农就立即揭发批判。广大贫下中农讲阶级亲，不讲“家族亲”，自觉抵制不利于革命团结的错误思想言行，人人争当革命团结的促进派。

实现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的团结，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越高，就越能团结起来，为发展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共同战斗。自然条件最差的第九生产队，一百六十亩地全是沙荒，开始有的人对改变面貌没有信心，想另找门路，有的闹不团结，要求“跳队”。后来，党支部帮助这个队抓紧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学习大寨大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雄事迹，开展新旧社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对比的教育。贫下中农说：“一人一条心，穷断骨头筋，众人一条心，沙窝出黄金。要大干社会主义，就要团结一条心，迎着困难上。”全队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组织了四十多名贫下中农骨干队伍，带动男女老少，冒严寒，顶风雪，大干苦干，翻沙造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几年来，他们搬沙丘，填洼坑，修沟渠，打机井，平均每个劳力每年挖土一千多方，改变了生产条件，连续两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

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我们还注意经常联系本大队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开展讨论，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个生产队因为添置拖拉机需要资金，个别人打着“为集体”的幌子，主张把队里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卖高价。大家围绕这件事进行辩论，明确了那种“只要为集体，干啥都有理”的说法是错误的。有没有理要看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才有理。如果只为小集体打算盘，不顾以至损害了国家的利益，那实际上是放大的个人主义，谋的是少数人的私利，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毛主席教育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党和国家的政策，只图为本集体增加收入，就会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损害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根本利益。明白了这些道理，干部群众就能够比较正确地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凡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就齐心来干；背离社会主义的，就坚决抵制。大家自觉地把各种农副产品优先出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七四年，这个生



产队超额完成粮食交售任务五万多斤。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而不能只靠少数人。我们不仅要组织和团结好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同时还要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这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过程中，我们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对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予以打击，而对少数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干部群众，则让他们在斗争中接受教育，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这样做，既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又团结了干部群众的大多数。

当然，我们讲团结干部群众的大多数，包括团结那些犯有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并不是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坚持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要有团结的愿望，是为了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我们支部有个党员，过去犯过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又在党支部里面闹分裂。有的同志认为，对他要从严处理，甚至主张不让他继续留在党内。支部书记却没有因为他曾经反对过自己，以感情代替政策，而是出以公心，满腔热忱地帮助这个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同时，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对这个犯错误的同志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识统一以后，对他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个党员担任理论辅导员，发挥了带头模范作用。平时，我们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坚持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逐步加以解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既看到他们受到家庭影响的一面，又看到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愿意进步的一面，热情鼓励他们听党的话，走革命的道路，并经常吸收他们参加批林批孔和其它政治活动。

路线对，团结好，面貌变。我们大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年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干部群众讲路线，讲大局，讲团结，步调一致，共同战斗的局面。我们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疆英吉沙县包孜洪十五大队党支部

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在批林批孔的凯歌声中，全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豪情，迎来了新的一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大队的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决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搞好批林批孔，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

“包孜洪”，维吾尔语是荒滩的意思。旧社会的包孜洪，是贫下中农的地狱。“冬天白茫茫，春天苗发黄，夏天风沙狂，秋收半袋粮”。这是旧包孜洪的真实写照。在解放前的十年里，就有上百人冻饿而死，几十户人家卖儿卖女，离乡逃生。“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解放后，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亮了帕米尔高原，指引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排除了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提高了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使包孜洪人换思想地换貌。自一九七〇年以来，粮、棉连年上《纲要》，过“黄河”。一九七四年同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百分之七十，棉花、油料增长一倍，牲畜由二千九百头增加到七千头，树木由二十万株增加到六十二万株。随着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共积累不断增加。大队购置了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开沟打埂机等大型农机具，基本上实现了机耕和机播。去年我们办了电，边疆农村也有了电灯。昔日的荒碱滩，如今处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渠道纵横道路直，条田平整树成林，六畜兴旺粮棉多，机声隆隆电灯明”。这已是今天包孜洪的现实。最近十年来，我们大队交售给国家的余粮六百万斤，棉花一万一千担，油料十万斤，牲畜两千头，木材五百五十立方，各种水果四十万斤。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社员的生活日益改善，大部分社员有存款。除集体储粮四十万斤外，社员家家有余粮，共储粮二十万斤。全队九百多户社员，都搬进了新建设的居民点。大队实行合作



医疗，有卫生所，有赤脚医生。适龄儿童都能入学读书，还有九名青年到北京、西安等地上了大学。包孜洪的今昔对比，真是换了人间。各族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更加热爱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回顾走过的路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根本的就是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解放以来，党内历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在我们包孜洪都有反映。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在上面叫，我们村里的阶级敌人就在下面跳。这些斗争，都是围绕着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的。一九五四年，党组织带领十六户贫下中农和两户中农，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包孜洪办起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在这时，刘少奇大喊什么农业合作化运动“冒进”了，勒令“坚决收缩”，妄图砍掉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让资本主义在农村滋长。我们村里的阶级敌人也兴风作浪，煽动中农退社，甚至烧掉集体的马厩，抢走集体的耕畜，妄图阻止社会主义的前进，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刚出现，毛主席就赞扬“人民公社好”。我们贫下中农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建立了人民公社。可是，彭德怀这个家伙却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胡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刘少奇、林彪一伙也紧密配合，鼓吹“三自一包”、煽动“包产到户”，梦想搞垮人民公社，开历史的倒车。我们队上的阶级敌人又乘机煽动单干、跑买卖、弃农经商，妄图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我们贫下中农胸怀朝阳学大寨，意气风发，战天斗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而阶级敌人却诬蔑学大寨是“干部出风头，群众活受罪”，利用宗教迷惑群众，妄想破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面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我们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带领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针锋相对地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这才使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集体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



改善。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就结束了。在我们大队,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灭亡,仍在窥测方向,进行破坏捣乱。资本主义倾向也经常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有些人还干出这样那样损害集体经济的事。我们有的干部在大好形势下,放松了阶级斗争,不按党的基本路线办事,甚至支持一些资本主义倾向。针对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这些表现,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动群众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文化大革命前后对比,两条道路、两种结果对比,联系实际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和孔孟之道。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大队在一九七四年,遇到了三次大的自然灾害:早春低温多雪,不利于冬麦管理,推迟了春播期;春季和夏初干旱缺水;七、八月份山洪暴发冲掉了五百多亩水稻和包谷。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仍然斗出了一个丰收年。粮食平均亩产继续过“黄河”,棉花平均亩产达到一百零五斤,比一九七三年又有增长。事实反复教育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所以,对于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对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农业不断向前发展。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我们维吾尔民族中,孔孟之道和其它反动剥削阶级的思想,宗教迷信等旧意识形态,仍有很大影响。一小撮阶级敌人竭力散布封、资、修毒素,同无产阶级争夺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争夺青年一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抓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努力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现在,我们大队有理论学习小组二十二个,学习骨干二百四十多人,十七个生产队都有学习辅导员。这支队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群众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搞好学习和批判起了带头和骨干作用。我们还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学唱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表演革命舞蹈,并自编自演反映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节目,很受群众的欢迎。大队阶级教育展览馆,已成为对干部、



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重要场所。我们组织知识青年编写、讲解本大队的阶级斗争史、家史，并请老贫农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几年来观众、听众已达九万多人次。此外，我们还办起了政治夜校、文化室、广播站、油印小报、大批判专栏和漫画专刊。通过这些形式，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发扬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由于抓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社员群众的思想大解放，觉悟大提高，心想天下大事，手干革命活。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年劳动平均在三百天以上，密切了干群关系。知识青年进一步坚定了扎根农村的决心。移风易俗办婚事，破除迷信办丧事，男女分担家务等已逐渐成为风气。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树立雄心壮志，想长远，抓当前，不断与保守思想作斗争，反对懦夫懒汉的世界观，引导群众向大自然进军，努力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从我们大队来看，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是：春旱秋涝，土壤盐碱化，耕地高低不平。一九六四年我们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决心学习大寨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彻底改变包孜洪的落后面貌。就在那一年，我们发动群众制订了一个十年的长远规划，开始实行水、土、林综合治理。十年来，我们依靠群众的干劲和创造性，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搬走了一百六十多个土山丘，填平了三十八条大沟，开荒造田三千二百亩，把一万多亩七高八低的小块地，建成为四十四块适合机耕的大条田。修建了长三十四公里的卵石干渠，田间的支、斗、毛渠配套成龙。营造了二十五条防护林带，全长三十二公里。种植了二千三百多亩苜蓿，每年有五百多亩实行草田轮作制度。生产条件的改变，有效地控制了风沙盐碱，防止了旱和涝，提高了土壤肥力，使粮、棉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们深深体会到，有了革命理想，有了雄心壮志，又有个全面规划，就能动员群众，对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地逐步进行全面的改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

我们战斗在祖国的西大门，肩负着保卫祖国边防的光荣任务。我们大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和建设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同形势发展的要求还很不适应。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我们决心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 杂 文 ·

“传心术”的妙用

赵 前

苏联的很多科学研究机构,近年来用所谓最新的技术,从事着一项在他们看来使得“科学正处于突破的边缘”的“科学”活动。这是一门什么大学问呢?说出来令人绝倒,叫“传心术”。苏修的御用学者们煞有介事地宣称:两个人相距十万八千里,不用任何电讯仪器,就可以彼此“传心”,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医生不接触病人,也不用任何医疗器械,就可以为病人诊断、治疗;教师“可以通过不用语言的传心术来影响受教育者”;间谍不必跑到人家国家里,仅凭“视觉想象”,就可以拍摄别国的武器装备。“传心术”的作用可谓神妙极了!

“传心术”是什么新发现吗?否。这不过是古已有之的江湖骗术。比如,在我国两千多年前,孔老二的门徒就曾炮制过曾参与他母亲“传心”的故事。说是有一天,曾参的母亲在家里一捏自己的胳膊,身在野外的曾参的胳膊也跟着痛了起来,并且晓得这是他母亲要他回家。汉朝的唯物主义者王充质问道:“曾母病,曾参也要病么?曾母死,曾参也要死么?”这就一针见血地揭出孔老二门徒蓄意宣传的所谓“传心”故事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在西方,这种骗人的“传心术”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流毒甚广。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传心术”之类的活动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已经象瘟疫一样到处蔓延,成立什么研究会,举行什么报告会,大谈其“思想的直接传递”。连一些著名的科学家,象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生物学家华莱士等,都卷了进去,闹得乌烟瘴气。对于这种旨在“证明上帝存在,证明灵魂不死”的唯灵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给予了迎头痛击,并在与唯灵论的斗争中,进一步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恩格斯在分析华莱士和克鲁克斯的悲剧时，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

思想是存在的反映。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无不是经过感官而达于大脑的。感官和大脑对认识世界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大脑好比加工厂，感官就好比是为大脑这个加工厂采购原材料的“采购员”。没有感官从客观外界“采购”来的原材料，大脑这个加工厂就加工不出产品，形成不了思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无不是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们的感官反映到头脑中来而产生的。有了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才能在实践中感觉到客观事物的色、声、香、味、形等特性。不要说两个人相隔千山万水，就是一墙之隔，如果彼此不用语言交谈，也是传不了心的。列宁说：“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这是为人类大约一百万年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列宁阐明的这一真理如今已被那些不肖子孙们丢得一干二净。西德有位传心迷写道：“一九五六年以前，苏联还宣称传心术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虚构”。后来怎样呢？还是这位传心迷写道：“六十年代初期，从莫斯科传来了惊人消息，给相信传心术的人意外地带来了新的鼓舞。”这段评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传心术”在苏联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大走红运。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有“传心术”实验室，在某些刊物和科学杂志上有鼓吹“传心术”的文章。“传心术”的试验如蝇逐臭地吸引了科学、文学、政治等领域中的不少人参加。“传心术”在苏联的泛滥，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复辟活动紧密相连。苏修的某些人声称：传递思想的能力是“出现在某些人身上的返祖现象”。这真是说得妙极了！不过这不是人们生理上的返祖，而是苏联社会出现了“返祖”和复辟。苏联的党和国家变了颜色，“传心术”也就在苏联的国土上复活了，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所必然出现的现象。

苏修有一些所谓“传心术”专家异想天开地说：“教师用这种不言自明的传心术教学生，教师不到场，就不会引起学生的反抗。”一言泄漏了天机，原来他们鼓吹“传心术”是由于惧怕人民群众的反抗。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威信扫地，四面楚歌。苏修



当局好象坐在一座活火山，人民群众的反抗怒火喷薄欲出。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苏修统治集团在对人民群众继续施展“刽子手职能”的同时，进一步耍起了“牧师的职能”，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宗教来麻醉人民。于是“传心术”时髦起来了。也许是因为宗教过于陈旧的缘故吧，苏修学者以为把灵魂从教堂搬到科学实验室里，为上帝涂上点科学的脂粉，就不会被人怀疑为提倡宗教了。那里知道，尽管苏联官方把“传心术”吹得神乎其神，受压迫的苏联广大人民的心，同压迫苏联人民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心，却仍然天地悬隔，不能相通。苏联人民纷纷起来谴责“传心术”是骗子术。这么一来，苏修的御用学者再也按捺不住了，歇斯底里地叫嚣：“对心灵学就象对宗教一样，信仰胜于事实。”这就兜底说出了隐藏在“传心术”背后的宗教本质。“传心术”不过是不带十字架的宗教罢了。它和前几年在苏联曾经喧嚣一时的所谓“共产主义基督教”完全是一路货色，都是苏修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即使在“传心术”这样一种骗术上，两个超级大国也要勾心斗角一番。美国说这类宣传“具有广告的性质”。苏联呢？当它知道美国在宣传美国传心术士仅凭“视觉想象”就拍摄了苏联火箭装置的照片以后，大动肝火，深感丢脸。苏美两霸既相勾结又相争夺而以争夺为主的现状是无法改变的。尽管双方一直想“传心”，并且都声称自己在“传心术”上有“发明”，但最后还是传不到一块儿去。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两个恶霸之间相互欺骗、相互讹诈的关系。他们两家的“缓和”高调越唱越高，可是互拆墙脚、争夺世界霸权的丑事却层出不穷。苏美首脑近几年来一再会晤，签订了许多协定和文件。被苏修吹嘘为“缓和”的“里程碑”的这些协定和文件，其实不过是一堆废纸。双方的限制核武器协定越多，双方的核竞赛就越演越烈。所谓“缓和”的“里程碑”，倒成了两霸加紧争夺的“里程碑”。在所谓“持久和平”、“一代人的和平”的喧闹声中，人们看到的事实却是：一个超级大国正在利用各种手段向外进行渗透和扩张，力图在欧洲、中东和世界各个地区挤进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取而代之，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不用任何“传心术”，双方的心思都早已被人们看透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苏修新沙皇心中在想些什么，只要看看他们干的那些卑鄙的勾当，就一清二楚。剩下的只是一堆谎言。而全世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汹涌澎湃的浪潮，一定把苏修的一切谎言（包括“传心术”在内）冲刷得干干净净。

